

上海论坛动态

全 球 治 理 与 亚 洲

第12卷 第2期 (总第36期)

2019.09



新闻

- > 上海论坛2019:
汇聚全球智慧, 打响上海品牌, 复旦智库发声

聚焦

- > 上海论坛2019开幕式大会
主旨演讲
- > 上海论坛2019闭幕式大会
复旦智库报告总结
高端圆桌总结

专题

- > 上海论坛2019嘉宾访谈
 - > 嘉宾建言
 - > 观点集萃

信息

- > 上海论坛高端圆桌申办向全球开放
 - >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 >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 > 复旦学者
- >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 >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国际顾问团（以首字母为序）

- | | |
|---|--|
| <p>1 Abdullah Gül
土耳其第 11 届总统（2007-2014）</p> <p>2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p> <p>3 Arkebe Oqubay Metiku
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p> <p>4 崔泰源
韩国 SK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p> <p>5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 <p>6 Dagfinn Høybråten
北欧理事会秘书长</p> <p>7 Enrico Letta
意大利前总理</p> <p>8 Fabrizio Saccomanni
意大利前经济财政部长</p> <p>9 György H Matolcsy
匈牙利央行行长、前经济部部长</p> <p>10 Joseph E. Stiglitz
200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 | <p>11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经贸前首席谈判代表</p> <p>12 Michael Spence AC
悉尼大学校长</p> <p>13 Paulo Portas
葡萄牙前副总理</p> <p>14 Robert Shiller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 <p>15 Robert Zoellick
世界银行前行长</p> <p>16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前执行秘书</p> <p>17 河村建夫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p> <p>18 Temir Sariiev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p> <p>19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p> |
|---|--|



上海论坛动态

上海论坛是目前在上海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论坛创始于2005年，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每年5月，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六百余名嘉宾齐聚上海参加年会。

《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更好发展。

主办方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编委会

主任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焦扬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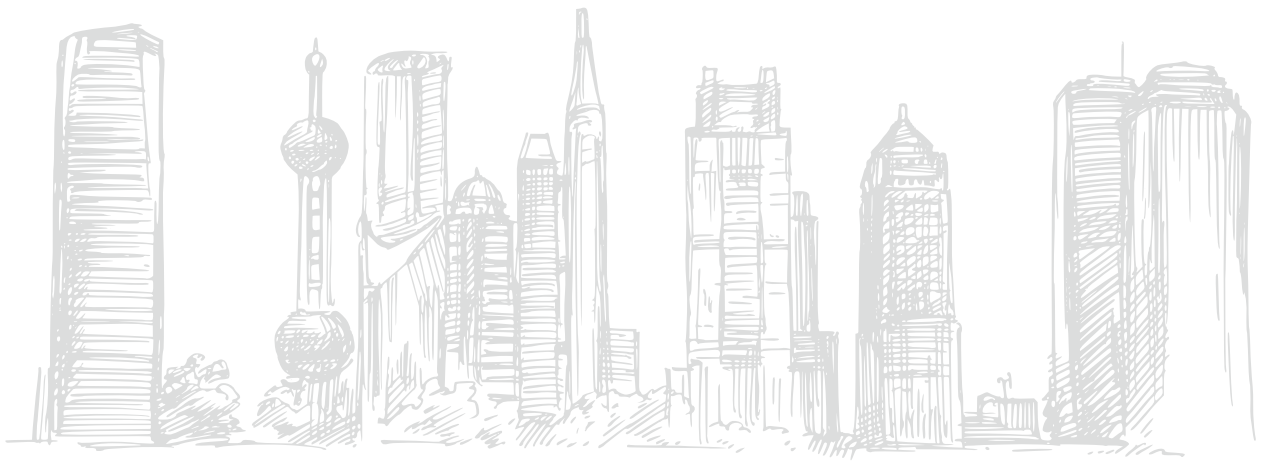
陈志敏	复旦大学副校长
-----	---------

执行副主编

张怡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陈寅章	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长

副主编（以姓名字母为序）

Arlene B. Tickner	罗萨里奥大学政治科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主任
陈家宽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Dániel Palotai	匈牙利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冯建峰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Jesse Pipes	沃克商学院讲师 中美何兰学者项目负责人
敬义嘉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Kai Riemer	悉尼大学商学院商业信息系统系主任
Kenneth Sim	泰晤士高等教育咨询专家
梁鸿	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卢长祺	丰实金融集团董事长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沈逸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宋恩荣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
孙立坚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许 闲
杨 青
俞卓伟
张家栋
张 军
张 凯
张维为
郑 宇
朱 伟

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生物医药医务界同学会会长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宏保险首席执行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责任编辑

罗 倩
邓梦佳
赵奕夏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主管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主管

执行编辑（以姓氏字母为序）

白玉川
丁常昕
候筱辰
黄 晨
黄 昊
姜 泽
焦露曦
康而力
李昱昀
刘斯媛
钱 宇
钱斯蕴
邵夏怡
沈婵婧
沈 琛
吴 涛
辛艳艳
于 杨
袁晓凤
赵精一
朱红蕊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业务一室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部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执行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部部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副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业务一室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业务一室研究员

目 录

第12卷 第2期 (总第36期) 2019.09

01 新闻

上海论坛2019：汇聚全球智慧，打响上海品牌，复旦智库发声

04 聚焦

04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王家瑞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Michael Spence 悉尼大学校长

Paulo Portas 葡萄牙前副总理

朱 伟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18 闭幕式大会复旦智库报告总结

乱局与变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8

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008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老龄社会应对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共治：电子商务纸包装的现状、影响与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外商资本和科技创新研究报告

绿色金融助力长三角绿色发展

增强高质量创新开放，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

2019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24 闭幕式大会高端圆桌总结

如何重构东北亚格局？

中国2049：应对经济实力上升过程中的挑战

与 AI 共处——高明机器时代的人性

错综复杂环境下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工业再造

流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28 专题

28 智者对话

我们希望有最好的世界

32 高端访谈

金刻羽 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

薛 澜 创新环境下中国公共管理的作用与方向

刘建国 全程耦合视角下的流域生态保护

张海冰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与全球治理新秩序

陈 雯 区域协调机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作用

顾朝林 全球视野下的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Matthew Kiernan 脑智融合及AI医疗的医学角度思考

David Dollar 不断变化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挑战与机遇

53 嘉宾建言

54 观点集萃

高端圆桌

高端圆桌01：脑智融合：人工智能超乎想象

高端圆桌02：工业再造

高端圆桌03：监管科技：共建金融业监管能力与企业活力良性生态

高端圆桌04：如何重构东北亚地缘政治？

高端圆桌05：南海共同开发的创新思维与务实策略

高端圆桌06：错综复杂环境下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高端圆桌07：在全球转变时期提供公共产品：来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观点

高端圆桌08：中国2049：应对经济实力上升过程中的挑战

高端圆桌09：金砖国家务实合作与全球治理新秩序

高端圆桌10：推进WTO改革：亚洲与欧洲的角色

高端圆桌11：全球公共政策：全球化时代的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高端圆桌12：金融科技与数字丝绸之路

高端圆桌13：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愿景、挑战、路径

高端圆桌14：绿色金融发展与长三角一体化

高端圆桌15：土地供应和都市增长——沪港及全球大城市经验探讨

高端圆桌16：流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高端圆桌17：和谐与精彩

高端圆桌18：企业社会价值的创造：创新、共享与可持续发展

高端圆桌19：与AI共处——高明机器时代的人性

65 信息

上海论坛高端圆桌申办向全球开放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复旦发展研究院 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复旦学者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上海论坛 2019：汇聚全球智慧， 打响上海品牌，复旦智库发声

5月25-27日，“上海论坛2019”年会在上海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共700余人参加了论坛。

25日开幕式上，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韩国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家瑞先后致辞。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焦扬主持开幕式。

陈群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力推进增设自贸区新片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等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还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期待上海论坛涌现出更多成果，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许宁生代表复旦大学向出席上海论坛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期待上海论坛能推

动“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这一亚洲发展新范式的形成，并持续不断地为亚洲、乃至全球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建议，成为国际前沿成果集聚、中外人文交流拓展的优秀平台。

崔泰源在演讲中分析了亚洲正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更多企业和个人应该加强联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希望上海论坛能持续发挥这样的纽带作用，在探索亚洲创新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王家瑞在致辞中分享了他对亚洲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看法。他认为，加强同亚洲国家交流互鉴，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目标和现实任务，是对自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是对自身发展水平的清醒判断，是对各国青年寄予的殷切期望。他希望上海论坛通过全方位、多层面的议题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寻找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方法，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路径，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主旨演讲。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葡萄牙前副总理保罗·波塔斯（Paulo Portas），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朱伟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包含“新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秩序：全球变局与结构重塑”、“新高度：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四个板块二十多场高端圆桌，以及首次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全体工作会议与复旦—拉美大学联盟第二届理事会会议等，共30场学术活动。

论坛期间，复旦大学与悉尼大学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教学、培训、科研项目等多方面携手开展一系列国际合作，促进双方在学科交叉和科研领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同时，复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及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在论坛上举行了启动仪式。

论坛于5月27日顺利闭幕。闭幕式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对本届论坛圆满举办表示祝贺。她说，本届论坛聚焦“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的主题，与会嘉宾充分交流思想、融汇观点、集思广益，大家都认识到，唯有顺应

时代潮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精神支撑，坚持平等对话、创新驱动、开放融合，迈向命运共同体，方能开创亚洲新未来。她希望上海论坛继续立足上海、服务国家、面向世界，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为推动上海、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朴仁国充分肯定了本届论坛的组织工作和过去14届论坛取得的重要发展和阶段性成就。朴仁国表示，亚洲正在全球文化版图上崛起，双方要共同努力把握科学创新带来的机遇风险和社会影响，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和平发展营造现实空间。

本届论坛上，复旦智库集中发声，为当前国家重大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热点话题建言献策，成为论坛的一大亮点。由复旦发展研究院编辑的世界系列、中国系列、上海系列、未来系列共10份智库报告在闭幕式上陆续发布，主题涵盖国际战略，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南海共同开发，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老龄社会应对，粤港澳大湾区外商资本和科技创新，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更高质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绿色金融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电子商务纸包装的现状、影响与建议，2019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等。

本届论坛年会共有近 700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学界精英和媒体代表齐聚复旦，围绕“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亚洲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节奏下可能发生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通过各方承办的分论坛、圆桌会议、高端对话等多元形式，论坛分享了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地区的发展经验，探讨了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思考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研究了生态文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展望了绿色金融创新、监管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发展蓝图。

今天的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等 4 点主张，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本届上海论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召开，与会代表充分交流思想、融汇观点、集思广益，初步达成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精神支撑，迈向命运共同体，方能开创亚洲未来的共识。

论坛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板块地区性崛起成为世人瞩目的时代趋势，站在新时代的浪头，亚洲要勇往直前，继续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文明交流是亚洲发展的坚实保障，应当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开阔眼界，增进共识，减少政治和历史因素的束缚和羁绊，用对话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化解争端，共同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科技创新是亚洲发展的不竭动力，应当加快亚洲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速度，以科技创新的新成果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跃

升，以科技创新的新突破激发社会进步的新活力，更好地认识自我、改造世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绿色生态是亚洲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应当追求绿色繁荣发展，生态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为亚洲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固本强基。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旨在搭建中外政商学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区域发展及国家大计建言献策。自 2005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13 届年会，出席论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近 5000 人次，上海论坛 2019 是第 14 届年会。论坛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以求更好地为人类进步、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服务，是目前在上海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为上海打响“四大品牌”汇聚来自全球的智慧。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王家瑞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焦扬书记、各位来宾、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论坛给我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我记得 2005 年上海论坛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也曾荣幸地有机会出席，并且作了发言。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又有机会来到年会现场，依然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们。比如崔泰源先生，我们无论是在韩国、在北京、在上海都有机会相见。还有谢淑丽女士，昨天我与她进行了很愉快的交流。在对外工作中也曾有机会跟她坦诚交谈。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其他老朋友了。此外我也有机会结识各位新朋友，这都令人喜悦。所以我要对上海论坛这次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对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致以我亲切的问候。

刚才许宁生校长、崔泰源董事长，上海市的各位领导，都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讲话，阐发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听了很受启发。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在目前亚洲形势甚至世界形势出现复杂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上海论坛能够以“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为主题展开讨论，可谓是正逢其时，很有意义。十几天前，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功召开，取得了丰硕成果。来自 47 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五大

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相聚北京，共同探讨亚洲文明共生共荣之道。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发表了主旨演讲，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同，在各国民众中也引发了强烈反响。

我目前还担任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主席。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民团体，我们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同样也承担了大会的一部分亚洲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有一个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活动基地，主要面向的群体就是少年儿童。

在座的崔泰源董事长、朴仁国事务总长，在去年的 5 月 4 日，我记得是那一天，也到访了我们的基地。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来自 13 个国家的 200 多名青年，来到了我们的科技基地“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基地中，他们体验了门类齐全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茶道、书法、京剧、印染、刺绣、中医等。他们很兴奋，也各自介绍了自己国家的特色文化。体验交流结束后，很多青年兴奋地说，这是自己第一次亲身体验这么多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有趣，并且希望再来。

我们通过与外国青年朋友，包括各界的朋友进行体验交流，也更加深入地体会了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的深刻内涵。我们支持习主席就加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倡议，特别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同来自各国的青年人一起交流，分享彼此国家的文化。从这些接触中我感受到，亚洲的未来大有希望，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互相借鉴的、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希望就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之上。

当然，我们总是需要准确地把握现实，共同努力，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亚洲也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亚洲自然也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亚洲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纯粹属于亚洲可以固封的

问题，它是和每个亚洲国家、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相互影响的。

从机遇的角度看，亚洲是世界七个大洲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亚洲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稳定器。2018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在全球贸易遇冷的情况下，亚洲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

《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2018年的排名显示，在全球32个上榜国家中，亚洲有11国，达到总数的3成；总上榜企业总共是204家，达到总数的4成。这就是机遇。

从挑战的一面看，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金融风暴、民粹主义、极端主义，都对既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全球治理产生了新的冲击。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深度关联与不断增加的智力赤字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老钥匙开不了新锁”，原有的一些理论和思维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格局发展；旧的制度和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步开始凸显。就亚洲而言，我们已经长期面临国与国之间交流交融不够充分、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低效、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升温、极端主义肆虐蔓延等等问题。

面对可以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会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的：中国一直并将继续加强同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我们主张加强同亚洲国家交流互鉴，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目标和现实任务。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积极贡献，文明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冲突的根源，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对抗的理由。当今的亚洲，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文交流应该成为亚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展关系的重要桥梁，我们将尊重亚洲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主张加强同亚洲国家交流互鉴，是对自己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人历来崇尚和而不同、贵和持中的理念。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铭刻下了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

历史足迹，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友好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

相对于世界而言，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文明交流、交融更为密切，也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希望通过像上海论坛这样的重要多边平台，为亚洲各国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提供重要渠道，推动国与国之间各种合作走深走实，为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我们主张加强同亚洲国家交流互鉴，是对自身发展水平的清醒判断。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但中国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不少差距，中国仍然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向世界各国、不同文明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证明，开放的心态就是自信的心态，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

我们主张加强同亚洲国家交流互鉴，是对各国青年的殷切期望，青年是各国的未来，是亚洲大家庭友好事业的传承人，希望上海论坛更广泛地凝聚各国青年人的力量和智慧，让他们在参与交流互鉴中共同成长，成为亚洲友好事业的生力军。我担任位于北京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位于上海的“中国福利会”这两家机构的主席，也借此机会表示，愿意同亚洲各个致力于亚洲友好事业的民间团体和广大青年一道，为新时代开创亚洲友好合作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初夏的上海万物葱茏、生机勃勃。前几天刚刚过了中国农历的小满，这个季节意味着农作物的子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到大满。从2005年走到现在，上海论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收获了不少知识财富，也可以说正处在最好的小满时刻吧。希望上海论坛永远保有一颗“小满”之心，继续通过全方位、多层面的议题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聚焦人类社会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以此寻找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方法，探求人类社会进步的新路径，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年度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经贸摩擦与中美关系展望

■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想谈三点。第一，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什么？第二，中国和美国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管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战略竞争？

首先，我认为经济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谋求经济利益是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在中美之间始终存在诸多政治与安全分歧的背景下，经济联系成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和粘合剂。

现在中国和美国正在进入战略竞争的时期，这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经贸和技术的竞争。众所周知，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政府内外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对华经贸政策思维。

第一种，我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如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一直在倡导的那样。因此我们看到了非常艰难的谈判，也看到了中美经贸关系起伏不定，摩

擦不断。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将会波及到政治安全领域，这意味着两国在这两个领域也难以建立互信。最终，中美关系将会起伏不定，摩擦不断。

第二种，我概括为“经济现实主义”。“经济现实主义”不在乎贸易本身，它所关心的是在对华贸易关系中不会增强中国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中国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差距。因此，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寻求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即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美国与中国在经贸、金融和技术的关系逐渐缩水。“经济现实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外溢效应也会使得政治与安全关系充满摩擦，冲突的风险会上升。因此，这是一种对抗与冲突型的双边关系。

第三种，我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中美关系，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应该按照多边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共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会在互补与竞争中继续发展，政治与安全关系也会体现出合作与竞争交织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更深一步地了解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及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中国态度强硬的背后逻辑。我认为美国对华有三种不同的心态。

首先，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许多其他领域赶超美国的前景的担心和恐惧。第二，对“接触政策”未能改变中国的失望甚至愤懑。部分人士认为接触政策未能像美国预期的那样改变中国，因此美国必须做出调整。第三种心态是长期以来不赞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敌视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这些人现在仍然称中国为“共产主义中国”和“红色中国”。对他们来说，与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在这三种心态中，我认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恐惧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最主要的驱动力。

实际上，看看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很显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已经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

首先，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美国声称是因为它不能相信亚投行会遵守西方标准和规则。因此，美国不仅决定自己不加入亚投行，还试图劝阻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不要加入。我认为，美国所谓“担心规则”，实质是担心中国挑战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第二，抹黑“一带一路”。在过去的两年里，尤其是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国务卿周游世界，告诉每个国家必须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债务陷阱非常谨慎。我认为，在所谓债务陷阱的背后，美国实则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第三，打压华为。最近，美国发起了对中国信息技术巨头华为的全球打压，美国国务卿和其他政府官员一直在谈论安全风险。这真的是安全风险吗？不。两天前，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他开始谈论华为的安全风险。节目主持人问他，你真的有关于安全风险的证据吗？他当然没有，所以他说，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们必须确保5G应该符合我们的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首先美国打“安全牌”来吓唬人。如果“安全牌”不起作用，那么就应该打“价值牌”来劝阻人们。如果“价值牌”不起作用，就打“文明牌”。中美两国是不同的文明，所以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美国关于中国的逻辑变化中看到，从国际规则到国际秩序和政治经济体系，从中国的外

交政策和安全行为到贸易不平衡，从市场准入到知识产权保护 and 产业政策等等，在言辞背后，我认为核心问题是美国已经认定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了重大挑战，美国要动员盟友和伙伴来遏制和阻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如果这不起作用，至少会减缓中国的崛起进程。

中国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做什么？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听到三个关键词：改革，开放，创新。

上个月，习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措施包括国际资本和投资的市場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此外，尽最大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最后，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所有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所以我认为习主席已经对下一轮的开放和改革做出了非常认真的承诺。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过去的几年里，西方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不满于中国的自主创新。他们说中国不信任国际供应链，不相信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是因为想推进自主创新。但是今天，看看华为和美国切断供应链和创新链的行为。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更大努力，确保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能够依靠自己。

对美国来说，它也应该进行反思。美国应该做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一些哲学性的思考。在国际关系中，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常态，美国不是生来就是世界第一，也不会永远是世界第一。这是历史的规律，对美国来说也不例外。所以人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哲学性的思考。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于美国精英和公众来说，他们总是喜欢抱怨来自外部的問題，然而美国今天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也不是来自中国。如果美国不能缓解其政治极化，如果美国不改善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如果美国不在研发上加大投资，如果美国不削减联邦赤字，那么无论中国崛起与否，美国肯定都会衰落。因此，决定美国未来的真正关键是美国内部的改革。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和谈判，贸易战正在升级。但我相信贸易战迟早都会结束，当贸易战结束时，我想我们可以获得几个重大启示。

第一，中美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代价太大，谁都承受不起。其次，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充其量只能放慢这个过程。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它对时间框架有着不同的理解。最后，中美在经济、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对抗只会加快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瓦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首先，相互尊重。不管美国有多强大，它仍然必须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和其他国家。“美国第一”的口号缺乏对他国利益的尊重，也没有表现出对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尊重。其次，求同存异。美国必须接受国家间政治制度、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文明形态划线。美国对中国的评价多年来一直是武断的。我们在承认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差异的同时，仍然可以发展合作，实现双赢。现在我真正关心的是美国的一种声音，说这场贸易战的背后是文明的差异，这让我们想起了18、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冲突。最后，两国应该进行良性竞争。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肯定会加剧，但是我们应该按照符合21世纪国际潮流的方式开展竞争。在这个过程中，要谋求共赢而非零和。尽管竞争不可避免，冲突和对抗可以避免。我担心的美国部分人民，包括特朗普政府，当他们谈论与中国的竞争时，想到的却是冲突和对抗。对于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竞争，提升自己而非打败对手，打败对手明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我对两国关系现状和未来的强烈关切。我秉承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两国人民，无论是精英还是公众，仍然有这样的理性认知，即我们不仅能以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方式，同时也以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教育改变世界：大学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 Michael Spence

悉尼大学校长



焦扬书记，许校长：

能出席本次活动，是我莫大的荣幸。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开始我的演讲。

首先，我们一直在关注大的格局，比如国际关系或者地缘政治的变化。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全球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而这些因素并不是唯一导致当前不确定性的源头，也不是唯一影响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以及工作本身的未来的因素。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话题缩小一些，谈一谈教育者在变革的世界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且把我们的焦点从地缘政治，转移到人工智能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上。因为大学能在变革到来前的最后一刻为我们找到方向，无论是在国家之间串起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还是在知识、理解、研究和教育之间架起桥梁。我非常荣幸能够带领悉尼大学的众多代表，与复旦大学在人工智能和脑科学领域上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关系。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未来的工作和未来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但都同意变化已经产生，并且变化的步伐只会加快。一些学者预计，在10到15年内，多达40%的现有工作将被电脑取代，那么目前在复旦大学和在悉尼大学的学生无疑要准备好面对日后生活中必然出现的几次职业转变，不仅仅是改变他们所需完成的工作或任务，而是完全转行，走上新的职业道路。大学研究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但我认为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大学研究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大学作为教育中心的作用。正是

因为大学是教育的中心，是培养未来指引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的领导者的地方，我们才需要思考。尽管过去的技术革命基本上没有影响大学教育的作用，没有为大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许多专业人士的工作，包括律师、会计师、医生等。正如路透社最近的一份报告所说，如今受教育越来越意味着拥有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心态，并做出适应环境的举动。本周早些时候，习主席也谈到了拥有适应力的必要性。所有大学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使他们在毕业后成为指挥机器工作的人，而不是被机器取代工作。我认为，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每一所大学都需要进行自我审视和改革。我们悉尼大学已经在这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会用悉尼大学作为案例来展开。此外，技术的变化也给教育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想在我的发言结尾简要地谈一谈。

首先，毫无疑问，大学必须仔细审视本科课程以及提供的课外经历，来判断其是否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有所帮助。考虑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悉尼大学刚刚大规模改革了本科课程，这一过程涉及广泛的国际咨询，对象包括专家、整个地区的雇主、学生和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群体。我们从一张白纸开始，询问他们一个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个人品质和智力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设计了新的本科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因此，悉尼大学目前所有的本科教育都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是在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跨学科能力





之间取得平衡。当然，在英语国家，本科教育模式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英国的教育模式强调单一领域的学习，而美国则提供广泛的文科教育。我在这两个不同的教育体系中都有教学经历，因此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传统的英国本科教育在有限的领域教给你无尽的知识，让你能够精通一个学科，而传统的美国本科教育是在无尽的领域里教给你有限的知识，也就是在各科都懂些皮毛。但人们普遍认为，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存下来的教育模式必须是“T型”的，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深度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深入教学，才能让学生有效地学习批判性思维以及书面和口头交流的技能，由此才能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不过，学生们仍需养成一种思维习惯，透过表面看到某一问题或某一学习领域的复杂性。然而现代世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应对全球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和平等问题等等，本质上是多学科的问题。毕业生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在多学科的团队中工作，能够快速学习非本学科的语言和知识框架。在悉尼大学，我们以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这一能力。首先，我们加强了未来学科教育的严谨性，以确保每个学生在特定的学习领域都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其次，我们要求学生必须选修一些学习单元，这些学习单元对全校同学都开放，有些是关于一个多学科问题，有些是向学生介绍他们所不熟悉的研究方法。第三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我们让学生能够选择并鼓励他们选择第二专业，无论他们的本专业是什么，都能在大学的任何学科进行第二专业的学习。我们发现，学生们选择的专业组合跨度很大，并且都有深入的研究，这往往出于他们对未来发展的考虑。

我认为本科教育的第二个特点能帮助我们度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难题，因为我们的学生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无论目前的连接多么紧密，许多政治家可能都在努力使我们分道扬镳。但是未来世界的联系终将日益紧密，文化也将日益多元化，技术的迅速变化使许多人感到自己的工作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为了促进跨文化理解，传统大学教育培养的商业、公民社会和政府的领导者将越来越需要超越自身文化框架的能力。因此，我们把培养跨文化能力作为本科教育的一

个重要目标。我们40%的澳大利亚学生在家除了说英语，还会说第二种语言，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将第二外语纳入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第二外语。此外，悉尼大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赴海外留学，比澳大利亚其他大学都要多，中国也是他们的一大留学目的地。同时，我们也实现了战略目标，让至少二分之一的国内学生在海外进行长期学习。

最后，我们深入思考了课程学习的内化以及如何在课堂上培养跨文化能力。我认为我们在本科教育的第三个特点上所做的规模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悉尼大学有近7万名学生和教师，而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进行一次长期的在现实世界里解决问题的实践。在此背景下，我们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英国和欧洲的公司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请他们找出一个他们正在解决的实际的战略问题，不能是人为设计或是编造的问题。然后他们需要与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团队合作，在多学科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学生需要在设计解决方案时体现出自己的学科对解决方案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多学科环境中的合作能力。这一实践将许多学生在本学科学到的知识、多学科学习和跨文化能力结合在一起，为他们迎接变化的世界做准备。在现实世界里，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边界，他们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与核心智力和专业技能一样重要。迄今为止，我们在世界各地合作过的组织对这一实践的反馈都很好，其中许多组织最终采纳了我们的学生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这一实践还将学习和实习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学生们在实习中的体验各不相同。

与本科课程的这三个特点相辅相成的是，我们正努力确保我们的校园生活能够培养学生成为未来领导者的必要素质。据我所知，这是许多中国大学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虽然有人预测校园生活将会消失，被数字世界中的生活所取代，但我们相信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校园中获得社交、资本和人脉网络，对我们的学生来说越来越重要。正是在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生们往往能获得许多所谓的人际交往“软技能”，这些技能的培养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的。此外，澳大利亚三年制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正在下滑，因为雇主们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要培养一名学生在现代职场中的竞争力，需要四年时间的高等教育才能逐渐成熟。可以说，随着工作中不确定性的增加，雇主们所说的这一点将会不断被证明，因为学生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在课外空间养成的。

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中的本科教育问题。听到雇主们谈论传统大学教育的价值，以及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一些新事物的思考，我感到非常欣慰。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进行实验，让学生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做好准备成为领导者的准备，但我们所说的“T型教育”、跨文化能力和将学习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世界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使得目前所有实验得以成功的关键。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大学的教育目标带来的第二个挑战

是研究生学习和终身学习。随着各地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市场的萎缩，大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60年课程”（The 60 Year Curriculum）这一计划。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加里·马特金指出，开展“60年课程”计划的核心意义是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延伸到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因为职业在不断地发展甚至彻底改变。随着一些职业消失和一些新的职业产生，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在不断调整，很难保证他们能在需要的时间获得所需要的教育，无论是专业知识教育还是“软技能”的培训，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不同的教育体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讨论个人和雇主提供教育的责任，需要在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不断为他们提供相关培训。未来我们将会面临的问题是，当前的很多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不仅将面临工作岗位的改变，还可能面临整个行业的消失，需要从头进行新的培训。而我们目前明确的是，通过传统的研究生学位和文凭进行再培训的模式过于死板和昂贵，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力的发展需求。尽管我们开设了研究生课程或授课式研究生课程，比如很受欢迎的工商管理学硕士（MBA）项目，但这些课程通常是作为本科教育的补充，是一种无工作经验的教育，只是给本科教育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而不是一种从业的资格认证。除了这类课程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与私立的线上教育平台合作开发在线的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大多数大学包括悉尼大学都开设了很多这样的课程。学生们为了完成这些网络课程的学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课程后将由大学授予相应的“微证书”（micro-credentialing），也就是划分更细、门槛更低的学业水平证书。学生可以获得单一课程的微证书，还有机会通过学习多个课程得到更有含金量的“微学位”。对于每一所大学来说，问题就在于他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新的市场，在线上开展更具灵活度的课程。当然，过去十年中大量出现的在线课程慕课（MOOC）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尝试。悉尼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开设了很多慕课，基本上所有大学都有这样的线上课程。但大学在此类课程上的投入较低，而且大部分的慕课都只是为了宣传学校的主流课程而推出的试用品而已，让更多的学生通过慕课尝鲜，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此外，大多数学校依然延续了提供延伸教育和专业发展课程的传统，慕课只是极少数能够大规模开展的“微证书”项目。对很多大学来说，系统性地进入“微证书”市场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因为要想有效地开展工作，教研人员所需要的能力往往是跨文化的技能，而不是单纯的研究能力，再加上学校计划在这一领域投资的多少也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学习需求，线上课程所产生的财政收益将会非常可观。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还是对现有市场的扩大，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就只面向校友开放线上课程。

最后，大学需要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本科教育、研究

生教育、“微证书”以及“60年课程”，还有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整个高等教育部门带来的巨大挑战。目前，大多数政府都对这一挑战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针对个别大学的挑战，而是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挑战。传统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别在于分工不同，至少在西方存在一定的阶级差异，比如机械工程师和技工之间就存在这样的差距。然而如今这些区别已经十分模糊，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越来越需要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而这些工人不一定需要具备大学教育所要求的全部素质。国际上的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抱怨，工程学和机械学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经不再显著，他们需要的是将这两者结合的技能基础，然而这在许多发达的经济体中都有所缺乏。德国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部门对众多科技大学面临的这一挑战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技能基础教育上大举投资，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有所行动。因此我想对中国政府说，你们是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为了建立一个服务于劳动力需求的教育体系，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所需的各种技能教育，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问题可能是让你在半夜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的问题。对于毕业生来说，即使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在工作中还是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人工智能使得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因此，大学有责任思考什么样的教育体系能够面向未来。政府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大学的科研方面投资，在全球争取领先，还要在人才培养上争先，尤其是对领导者的培养，因为我们的世界风云莫测，跨文化能力日趋重要，需要领导者为我们指路导航。我们悉尼大学很荣幸能够分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能与复旦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共同思考与讨论。我们相信，复旦大学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具增长动力和活力的重要部分。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Paulo Portas

葡萄牙前副总理



尊敬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尊敬的复旦大学校长，
尊敬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尊敬的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各位大使，各位委员，各位外交官，
尊敬的各位来宾，

以及我之前在政府工作的同事，葡萄牙地区发展部部长米格尔·波瓦雷斯·马杜罗（Miguel Poiares Maduro）

大家早上好！

我接下来会谈谈中美关系，包括中美两国之间的历史、经济和地缘政治。我教的是地缘经济学，因为我认为这是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最佳方法。与从前相比，如今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关系。

的确，过去四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有了新的经济秩序。但是，40年不足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我们拥有新的经济秩序，但却面临全球的政治秩序瓦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思考、重新定义我们世界的全球政治秩序。我将阐述一下为什么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能更好地推动全球化，为什么中国会在数字

化的问题上给世界带来惊喜。我想强调，全球化和数字化经常被当作是一个概念。其实，两者相辅相成，但两者又是不同的概念。你可以暂时让全球化停下脚步，但是你却无法阻止数字化的进程。这就是主要区别所在。

首先，我想请各位看看在过去这40年中发生了什么。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5%，而40年前，亚洲的贡献率仅约为20%。所以，如果亚洲出现问题，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如果仅从中国本身来看，上升趋势则更加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计算的GDP，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9%，但在40年前还不到10%。诚然，40年在人类历史上算不上什么，但却足以发生这一巨大改变。

看看那些处于全球化核心、处于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欧洲大陆经济体以及其他区域经济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这一出口大户会受到全球贸易战的影响，为什么另一方面中国也比美国在货物贸易方面更受关注。在我看来，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全球化的推动力都是贸易，而这也已经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了，这已经成为了事实。40年中不仅货物贸易量增长了10倍，更重要的是，我想请各位关注的已不再是演变，而已经是变革。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仅为0.9%；去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2%。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货物第一出口大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们，的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约翰·保罗二世都在上世纪80年代为世界带来了部分改变，但是，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通过改变中国，他改变了亚洲。通过改变亚洲，他改变了世界。

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如果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这更是亚洲的崛起。也许欧洲、美国等地区的一些工厂对于世界的新形势感到不舒服，但是请注意，

这其实是一个更平衡、更公平的世界。如今的经济联系不再仅仅是北方之间的联系或是西方之间的联系，而是南北、东西、东南、西北之间的联系。

我也想请各位注意我所说的“规模影响”。30年前，1990年时的世界十大公司排行榜上，所有的旗帜都是美国的国旗。30年后，第一处不同就是世界十大公司排行榜上旗帜更加多元。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排行榜上旗帜的不同，而是90年代位列榜首的公司的收入放在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其跻身前十。公司合并、并购使得公司的规模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甚至也许未来某天我们会为增长速度过快感到后悔，因为这样的公司将很难管理，也无法弃之不顾。显然，中国很好地推动了全球化，如果从数字化角度来看，则更加明显，且对于欧洲而言尤为明显。在世界十大数字化公司排行榜中，目前还看不到欧洲公司的身影。这场竞争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未来几年，排行榜上会有六七家美国公司、三四家中国公司。但是欧洲排名第一的音乐播放公司 Spotify 却不在全球前十强之列。这才是布鲁塞尔应该关心的问题，而非指责苹果公司。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在数字经济中，欧洲无法产生全球前十强。

此外，对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不满情绪其实是美欧地区的不满，在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却没有这样的不满，因为这些地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为这些地区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平衡的世界。我一位非洲朋友对全球化和数字世界充满希望。非洲在未来变化会很快，例如移民流动等。到2020年，智能手机数量将会达到7亿台，54个非洲国家会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

20年前数据流量方面大家能否找到中国的身影？但是我想在2016年，大家定能看到中国。所以说，在亚洲、在中国，数字市场发展潜力非常之大。我想特别提一下最近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量。中国在这一方面让世界大吃一惊，因为中国几乎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专利申请大国。如果不按国家来看，而是按照公司来看，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投入公司是哪家？华为。来自中国的53,000项专利申请中，有5,000项是来自华为的。这场技术战争背后的原因很清楚。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够在电子商务与移动支付方面成为美国独角兽的挑战者，这真是难以想象。所以我想强调，地缘经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显然地缘政治也会发生改变。很难想象我们能利用20年前的地缘政治平衡来维持现在的地缘经济关系。这是我想与大家展示的第一点。

另外，在我看来，葡萄牙是美国在大西洋非常友好的邻国，同时葡萄牙也将经济充分向中国投资者开放。我们知道盟国与友好关系之间的区别。但是，美国为何对这一不断变化的世界感到不舒服呢？我认为，这只是外界的看法。美国终于意识到，世界不再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占主导的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怪美国的现任总统。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孤立主义在美国由来已久。关于美国我想再补充两点。过度的移民政策限制会严重影响美国的竞争力，例如美国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硅谷需要的是吸引人才，而人才不是由国家、宗教、或大洲所决定的。所以，必须要开放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如果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过于狭隘，则会失去美国经济发展中特有的良好势头。美国40%的全球500强公司都是由移民或移民的后代所创立。而在硅谷，移民的比例更是高达58%。

我们如今对于美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但我们对全球贸易带来的危机又了解多少呢？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的最近一场全球贸易战，当时的情况与现在非常不同。美国决定向两万多种外国产品征收关税，由此造成的结果并非直接反映在贸易、经济增长上，而是反映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上。所以，我们知道，与金融危机相比，贸易危机不会直接在信用、资金上造成问题，但是贸易危机持续的时间很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此深表担忧的原因之一。贸易战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更难恢复。另外，对比欧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恢复上其实比欧洲更快、更果断。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结论。首先，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新的政治分化的世界，中美之间的两极分化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就是事实，通常很多事实都有着重大影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产生影响，但是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第二方面，欧洲自身面临着困局。如果联合起来，欧洲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集团；如果分裂，欧洲则会变得无足轻重。如果欧洲要在国际上发展，就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不仅要有软实力，还要有硬实力。目前来看，欧洲是有实力的。

第三方面，全球化中的很多变化在数字化中将会更加明显，所以说数字化加速了全球化。但是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数字世界中发生的最奇妙的事情之一。50年前，一家大公司的寿命是50年，今天只有15年。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里，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你可以很快通过与优秀的企业签订合同，转让这一想法，但是也请注意，下一个将取代你的想法也正在诞生。

第四方面，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空位。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为例。美国退出一年以后，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11个太平洋国家就决定不带美国重新签署协议。有全球化的经济却没有国际化的组织或至少全球性的规则，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会引起混乱。所以，方法就是要对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改革，而不是摧毁、消灭这些国际组织。

最后，我想强调，在全球化中，不可预测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谁能预测特朗普上台？谁能预测英国脱欧？谁能预

测西班牙的民族分裂危机？谁能预测意大利的民粹主义者？谁能预测最近所有的政治现象？在全球化中，不可预测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要灵活应对，不能过于死板。在充满活力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死板会走向灭亡。不管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什么，不管双方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美国和中国最终都要在利益方面相互进行妥协，因为无论通过什么协议，这都是唯一能够避免中美之间冲突升级甚至失控的方法。而这种冲突不仅是贸易上的冲突，而是互信上的冲突。目前遇到的危机其实是信任危机，信任恰恰又是最难建立却最容易摧毁的东西。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人工智能对亚洲消费市场应用场景的影响

■ 朱 伟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代表埃森哲公司参加 2019 年的上海论坛，也感谢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我想今天上午，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声音，就是各位嘉宾都提到，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局之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跟我一样有共同的感受，因为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个变局背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因素，比如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中国的崛起，民粹主义和人口转移等等。而在这之中，我和我所认识的埃森哲公司的同仁最关注的还是数字科技的飞跃发展，以及它给我们的商业、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因为这不仅和我的公司埃森哲的业务息息相关，也对每家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简单地讲一下，埃森哲公司是全球财富五百强企业中唯一的一家大型的专业管理咨询和技术服务公司，我们不生产、销售硬件和软件，而是为企业提供从战略到运营的端对端的专业服务，包括战略规划和业务重组，管理和营运提升，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流程外包和运营等

等。我们在中国已经耕耘三十多年，为中国企业积极地提供各项服务，支持它们的成功发展。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数字科技带来的颠覆，以及怎样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始终是我们咨询和科技领域中所关注的中心议题。明天上午，埃森哲将和复旦大学联合举行平行论坛“工业再造”，也欢迎各位光临，和我们一起探索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场数字变革为政策制定者、民间组织和企业负责人带来的领导力挑战，这个话题的焦点就是人工智能。

首先，谈谈近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坦率地讲，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红利都难以再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高峰期的近 30 个百分点降到去年的不到 1 个百分点，而且随着中国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红利也逐渐丧失，预计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在未来 15 年内会大幅减少。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希望之光。突破性的技术不断颠覆常态，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创造了无穷的可能性。突破性的技术浪潮从 50 年代的第一次以来，都给企业和





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而第七次技术浪潮的突破性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根据埃森哲的研究，到 2035 年，人工智能可以给中国 GDP 年均提速 1.6 个百分点，累计多增 7 万亿美元，并将中国的劳动力效率提高 27%。人工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一些方面会成为主导，中国在 AI 产业的投融资额与 AI 专利的数量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发展人工智能必须依赖海量数据，而中国正在积累明显的数据优势。在不同的行业中，中国的大数据量比美国要多出 5 到 300 倍。人工智能在企业的应用也已经凸显出巨大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平安集团下属的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应用来甄别贷款的风险，原来需要 1000 个小时审阅的法律文件，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强生公司和埃森哲等跨国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挑选应聘者，以最快的方式找到最合适候选人等等许多这样的案例。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也有很多的假设和恐惧。悲观的人认为，人工智能大有取代人类之势，这种观点不仅具有误导性，还会带来短时的危害。我们看到高德纳公司的预测，到 2020 年，AI 增强技术将带来 9 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并可节约 62 亿小时的工作时间，同时 AI 会创造 23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只削减 180 万个工作岗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埃森哲公司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先使得企业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人机的协作才是关键。埃森哲的研究显示，人机均有优势，各有所长，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所谓的缺失的地带。那么人机协作关系中，特别是在人机交互的中间地带中，将会产生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和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将很多的劳动力从繁琐、危险或是枯燥、重复的工作中释放出来，同时赋予他们一些新的机会和新的能量去做更有意思的工作。例如全球矿业巨头力拓矿业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管理钻机、

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从而避免操作人员在危险的采矿条件下工作，同时还获得了远程设备上的传感信息，帮助公司更加有效、安全地管理这些机械。在我们埃森哲全球有大约 17000 个工作岗位被自动化的技术取代，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一个新型技术平台在一年半时间又培训了 18 万名员工，使大家获得新的技能。

在过去 20 年，突破性的技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看到标普 500 指数显示的企业平均寿命已下降到大概 16 到 17 年，预计未来 10 年将有一半的公司退出标普 500。人工智能将影响企业战略的各个方面，企业需要从各个维度来分析论证，为企业制造新的竞争优势。今天我们埃森哲全球应用智能业务的负责人 Athina 博士也专门来到会场，她所带领的埃森哲应用智能团队为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潜心勾画了 10 年的战略发展途径。你们可以看到，通过不同的步骤和手段，在未来的 10 年，企业可以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竞争力，实现真正的增长潜力。

那么如何迅速将新技术转化为竞争力？如何应用人工智能使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也访问、学习和研究了很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优秀企业，我们的调研发现，领先的公司在应用新技术方面必须要遵循五大原则。首先是思维模式的改变，要突破流程自动化的局限，以同理心和共情设计 AI。第二是要通过实验积累数据和经验，营造敢于实验和试错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 Amazon 公司特别支持和鼓励员工进行突破性的实验，不走寻常路，不根据过去的成功经验或案例来重复实施，更多地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新的设计思维来进行创新。第三是打通数据孤岛，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特别强调自己有很多数据，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企业管数据的人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而负责分析数据的人又往往没有数据。怎么能把整个企业



内部的数据真正打通，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链，使数据能够发挥作用，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关键。第四就是要加强以人为本，发展员工与 AI 的人机协作技能。我们在欧洲的一个客户公司特别提出了“3050 计划”，针对所有的员工到 30 岁时做一个规划，来看看这些员工是不是真正能一直和企业共同成长，到 50 岁时还会有一个回顾，因为企业认为随着人机协作应用的提升，这些员工会更有价值，他们会希望这些员工可以跟他们捆绑着再做 20 年，一直到 70 岁。企业在这两个节点会做一个评估，来确保合适的员工会继续成长并发挥作用，这样的一种人机协作的技能提升也是 AI 使得企业能够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第五个原则，就是领导力。企业在部署使用人工智能，必须自上而下地考虑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影响，自始至终负责任地使用 AI，保证 AI 体系得出的判断和行动成果都能被合理地解释并消除偏见。

技术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善恶都只是针对人和组织而言，从根本上这是个自上而下的领导力问题。如今围绕人工智能在隐私权、包容性、平等、偏见、监控和操纵等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例如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依据用户数据和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喜好高度定制动态推送，这样将强化人们的一些认知偏见。人工智能在帮助公司甄选简历时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会否因为性别或种族因素自动排除合格候选人？人脸识别是否会被用于监视的目的？就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旧金山通过立法，禁止官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如何负责任地部署人工智能，我们认为有三方面的考量。第一，要以人为本，负责任的 AI 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应当以人为本这一概念。第二就是 AI 伦理的设计，确保技术人员接受培训，确保在自动化和智能系统设计和开发中进行充分的伦理考量，确保 AI 不会存在偏见、歧视或其他违反公平的道德价值观。第三，应该加强行业、政府与公众的合作，确保各方就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律、社会和道德考量保持一致，搭建积极的政策框架。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负责的人工智能也是一项领导力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数据量和可获得的程度是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但是宽松的数据治理也带来诸多隐患，在中国，围绕数据平台和 AI 的商业机会实在太大了，巨大价值的公司成批出现，从初创到估值 500 亿美元，可能也就只需要 3 年。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利益相关方，制定人工智能的监管和合规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挑战性的工程，技术和

商业本身都在不断演化，也给合理和灵活的监管带来重重挑战。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次上海论坛还设有平行论坛，就 AI 和人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期待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和成果。

各位，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局的时代，技术的变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机遇，最终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真正驾驭科技。如果我们加强合作，共同探索人与科技协作的最佳途径，那么我们相信，经过这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颠覆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闭幕式大会复旦智库报告总结



乱局与变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18

2018 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是纷扰不断、乱象丛生。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搅动国际政治风云，成为制造国际乱局的首要乱源。面对特朗普政府引发并不断激化的国际政治局势，世界各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和犹疑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并调整其既定政策，谋篇布局。

本报告指出，2018 年的变局大多与美国相关。在特朗普搅局的背景下，各国都在亟谋应对。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主要政治经济力量，或宣誓坚决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体制与原则，或积极推进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安排，或谋划减少对美国的金融依赖，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凡此种种，显示出世界开始认识到“后美国时代”自立、自强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本报告认为，2019 年，乱局不会终结——特朗普政府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性仍将持续存在，并且随着美国国内大选的临近以及在国内政治中来自民主党的严重掣肘，力争连任的特朗普很可能会在外交领域不断“发力”，使得国际政治乱局进一步恶化；变局也仍将继续——其他遭受打压的国家则会继续与美国进行强力周旋，并谋求建立“议题性联盟”和加强战略协调，更多地采取“抱团取暖”或是“两面下注”的方法，以应对日益不可预测的美国，

以及一个更加纷乱复杂、更富不确定性的世界，从而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出现新一轮的调整乃至重组。《报告》建议，面对国际形势巨变，中国外交要以冷静的判断、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奋发的作为有效应对。

本报告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报告共分为 13 个专题：信强教授撰写了《国际政治局势：乱中谋变》；宋国友教授撰写了《世界经济形势：从不确定到更不确定》；林民旺青年研究员撰写了《中国外交：稳周边、促开放》；吴心伯教授撰写了《美国：特朗普乱局》；冯玉军教授撰写了《俄罗斯：重回实用主义》；丁纯教授撰写了《欧洲：已破未立，艰难探索》；胡令远教授撰写了《中日关系：峰回路转，蹉跎前行》；张家栋教授、章节根副研究员撰写了《印度：从火中取栗到平衡求存》、郑继永副教授撰写了《朝鲜半岛：新形势与新机遇》与《朝鲜：走向“新并进”路线》、刘中民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撰写了《中东：对抗、僵持与失衡》、祁怀高副研究员撰写了《东南亚：大国博弈下的外交新调整》、韦宗友教授撰写了《印太战略：能走多远？》。各个专题多角度地透视了本年度重大国际事件与国际形势发展，深度分析了事件背后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互动与博弈，有助于更好地拨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幻，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势。



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报告指出，长三角多年的协同发展表明，市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政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建构统一的市场标准、服务平台、数据资源和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根本保障是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与创新；主要抓手是市场主导的产业自然集聚和分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融合，特别是瞄准若干前沿领域，打造人工智能、微电子、健康科技等核心产业集群；基本前提是人民获得感的不断提升，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起有利于实现社保一体化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协调和补偿机制，根据实际推动养老区域融合发展，积极稳妥地探索医疗服务与保障体系新模式，积极配合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安全的水源地和生态空间的维护为共同目标，明确各方的责任义务，共同保护，共同享用。

基于以上认识，报告建议，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要紧密围绕建设“世界级大都市圈”这个总目标，紧

密遵循“先进制造业”这一宽路径，要做好“产学研用结合”这篇大文章。与此同时，上海要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上海要体现战略高度，发挥五大中心作用，形成资源高差带动市场主体流动，促进长三角进行合理分工；上海要体现创新力度，发挥全球科创中心的作用，借助自贸区、科创板等政策资源充分调动长三角创新和产业动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强生态联合治理、共建基础设施、突出先行先试；上海要体现包容广度，立足全球和全中国，树立以上海为核心辐射整个长三角区的“大上海”视野，做好引领、当好表率。上海要在能力建设方面引领前沿，在生态建设方面持续深入，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在人才集聚方面创新思路，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一带”、“一轴”、“三区”空间构想。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具体实施方略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一个全新的庞大的高质量经济体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也将成为我国引领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2008 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本报告基于上海论坛 2018 中同主题圆桌会议的发言与讨论，内容包括对 2008 年金融危机遗留问题的评估；新多边开发银行的预期角色；基础设施行业和机构投资者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模式与新的智能基础设施的介绍。

报告指出，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 10 年后，出现了新的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目前，运用这种新的模式，新兴国家在第一时间缓解危机影响，随后在强有力地驱动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领导和协调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多边开发银行的设立可以说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主要制度遗产之一，其特点是结构转变和新参与者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和巩固。如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多边开发银行的设立代表着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加强。这些新的机构被认为会通过新的方法、新的金融产品做出贡献，也会推动创新驱动项目的发展。

报告认为，作为多边合作的重中之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本密集度高、周期长、社会效益复杂等特殊性质，需要加强协调合作力度、增强信息透明程度来提高项目吸引力、缓解项目风险、降低监管成本。新多边开发银行需要进行互补，以便加快完成其工作，优化工作结果。同样，新多边开发银行还需积极吸引私人资本的参与，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为成员国和人民创造价值和正向溢出。



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老龄社会应对

人口众多是我国最主要的基本国情之一，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而且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口学出发，未来 20-30 年我国人口总量趋于下降，但不存在“断崖式”或“雪崩式”下跌，出生率以及出生数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人口走势的决定性要素，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育龄人群持续缩减已成定局，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依靠放开生育数量限制并不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但可以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并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时间。如果生育水平持续过低，任何制度和政策安排都将很难具有持续性。

联系当前实际，报告认为近期战略部署中不可回避的政策主题主要包括：更新老年观念，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社会理性看待老龄化、重新诠释“计划生育”内涵，从“有计划的按政策生育”到“有计划的家庭自主生育”、正视

就业模式多元化现象，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劳动力与产业规划、加强代际转移支付研究，并强化对劳动人口的投资、强调“医养护结合”，优先并重点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在重构家庭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并支持现代家庭建设、善用“人口红利”，并论证在全球化背景下收获新型红利的可能性、充分重视科技发展对老年人和老龄政策设计的影响、积极论证如何将应对老龄化的“中国特色”转换为“中国优势”。

报告指出，作为一种全新且难以逆转的人口和社会形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新的基本国情。传统建立在年轻人口占绝对主体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架构都需要根据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做出相应调整及重构。每一个个体、家庭、社区、组织，乃至整个市场、社会和政府都必须在适应这种人口学变化的前提下更新或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结构，原有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也涉及重新选择。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共治：电子商务纸包装的现状、影响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速，快递物流行业作为电子商务行业的重要支撑同步兴起。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包装要求的逐渐提高，“过度包装”问题也日趋严重。复旦发展研究院与麦德龙中国邀请复旦大学玛丽·哈德教授团队，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分析。

本报告从国内外电子商务消费领域的发展现状切入，展示了过度纸制品包装问题的存在现状和其所带来的潜在环境危害，并进一步就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结合目前国内外的相关政策制定经验以及优秀的实践案例，尤其是相关产业从业人士针对这一议题的各项主要行业发展方向和未来研究关注点，对我国目前的电子商务消费领域中的过度纸制品包装问题提出展望和可行性建议。

报告指出，“过度包装”是系统性的问题，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是系统性的。解决问题的责任在系统的每一个环节，各环节必须明确其责任并承担责任，在互信、互重、互助、互惠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达成一致。利益相关方的视角都应当被正确的倾听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才能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协作改善“过度包装”问题。

目前，大众对于快递业的污染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其实也存在“过度”的现象，一味过分扩大纸制品包装的问题（例如“过度包装”“绿色包装”等），容易导致大众对其他环节产生的污染问题忽略。同时，目前物流快递行业中包装的统一行业标准或规范是缺失的，这一必要的统

一行业标准或规范应当尽快完善。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我们应对“过度”纸制品包装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多样化的，包括成熟智能化绿色仓储和物流体系，前端优化纸制品包装设计与应用以及末端进行促进消费者纸制品包装回收。不可忽视的是行业的巨大投入和潜心经营，但这同时形成了中小企业实现绿色物流的壁垒。

报告从宏观角度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治理观点。行业治理方面，技术创新是缓解过度包装问题的直接措施，同时应在商家、消费者以及设计等多项生产环节中树立环保意识，普及过度包装的危害性。环境治理方面，具体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上进行治理，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法律惩处力度。社会治理，解决过度包装问题需要包括消费者、业主团体、垃圾回收等多方面的共同协作，因此抵制过度包装，提高社会的整体意识不可忽视，可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向大众普及过度包装的知识、危害，改变社会对于“包装既是品质”的错误认识，提升社会对过度包装的正确认识。

我们应当将优秀环境思想和经验结合中国环境进行本地化转换，重视独立第三方的观点及建议，政府与市场合力治理过度包装，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并存的治理模式，并系统性的培养和改变消费者原有纸质包装的回收习惯，重视相关数据开放与收集以数据为基础进行监管，进一步加强公民环保意识，闭环环保相关环节。



粤港澳大湾区外商资本和科技创新研究报告

报告基于企业层面的注册资本和专利数据，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外商资本的现状及其对本地科技创新的作用，讨论了粤港澳大湾区内资本、技术和创新的关联基因。专利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报告选用的专利包括三种类型，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报告发现，广东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地高度集聚的区域之一，外资企业高度集聚在珠三角9个城市，其集聚程度呈现上升趋势。香港成为珠三角地区外商投资的第一来源地，并越来越倾向于投资珠三角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地，专利申请量占到中国大陆15%。外资企业尤其是香港企业是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在三大专利类型中，贡献了近1/4的珠三角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其中80%以上来自香港资本。香港资本的专利更多来自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但近年来香港企业在珠三角地区高端制造业的投资比例比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澳门资本对珠三角地区专利的贡献比较低，且主要是对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

湾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2019年2月18

日中国政府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能否成功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建设成败的一大关键。本报告利用微观大数据，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内资本、技术和创新的关联基因，对湾区内科创协同作出建议。报告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在于充分利用现有的粤港澳三地通过资本形成的创新网络，减少创新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创造更强动力的科技创新引擎。一方面，大湾区各级政府要继续推进更完善的人才吸引政策，除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诸如教育等基础设施以外，还要在签证简化、户籍管理、和个税政策方面给予足够的便利和激励措施，让香港和澳门的科技型人才更好进入珠三角地区创业。通过创新项目来吸引更多的资本，真正形成粤港澳三地的科技创新合力。另一方面，大湾区也应该鼓励更多元的国际性风险投资进入，投入更具颠覆性技术，实现其在国际创新领域“弯道超车”的目标



绿色金融助力长三角绿色发展

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理论表明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可以助力绿色发展体系的进步，而绿色发展也对绿色金融创新和发展提出新要求。

借鉴国内外对绿色发展的评估经验，本报告从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环境问题治理三个主要的维度，构建了三层的城市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自然禀赋、环境质量、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等展开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共计 22 项指标，基于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进行综合处理，对长三角 41 个城市进行评估打分（满分 100 分）。

从绿色发展综合排名上看，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发展现状呈现北弱南强，西弱东强的局面，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在空间上不平衡的特点，省际差异以及城市间差异明显。就绿色发展排名而言，在排名后 50% 的城市中，江苏省和安徽省占比超过 90%，上海市以及浙江省表现较为优异，而江苏省和安徽省则相对较为落后。从地域上看，狭义的“长三角”地区、省会城市和省内经济强市，包括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拥有广义长三角省区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其得分状况也普遍位居前列。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说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最终的发展目

标应为：保证在长三角地区每一个城市的居民都享有相同等级的“绿色福利”，并拥有相差不多的“绿色获得感”。

综合 2018 年发布的《长三角“40+1”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竞争力》报告，本报告对两套指标体系的得分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非常紧密，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能够带动绿色发展、服务于绿色发展，对区域绿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绿色发展的新需求也对绿色金融创新形成倒逼机制，两者之间有共同促进的效果。

为加强省一级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本省的绿色发展，报告建议：(1) 加强组织领导和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2)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将绿色金融发展落到实处；(3) 加强激励机制建设，强化信息披露要求。绿色一体化建设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为着眼于长远更快更好的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绿色协同发展，服务于长三角地区的绿色一体化建设，本报告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提出如下建议：(1) 建立政府间的工作协调机制；(2) 统一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体系；(3) 建立产业转移利益诱导机制；(4) 设立绿色协同发展专项基金；(5) 建立绿色金融创新服务体系和机制；(6) 加强绿色金融领域人力资源的储备。

增强高质量创新开放，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也是上海承担的重大使命。“十三五”期间，针对“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金融市场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初步形成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在营商环境和金融发展环境方面也有明显改善。

进入 2019 年，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的出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对此，围绕当前“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扩大金融开放等重大历史机遇，重点增强上海科技创新实力和对外开放质量，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将是接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具体路径上应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以“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为契机，推动上海资本市场改革和企业创新。突出信息披露核心原则，加强中介监管和主营业务审核，完善日内价格波动管理以及做空等

风险防范机制，严格重大违规企业退市，同时做好投资者保护机制设计，突出上市企业“科创性”要求。

二是利用自贸区制度优势扩大上海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重点培育和建设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总部进驻上海，进一步扩大上海各类金融市场开放度，尝试开展 FT 账户资本项目可兑换业务，拓展其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可复制性。

三是强化风险预警和防范化解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对 FDI 等长期资本建立有序退出机制，对短期资本建立窗口指导 + “动态托宾税”监管模式，同时加强对金融业务实质的穿透式监管，以及提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四是以科技助力金融行业创新带动上海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当前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已经成为推动金融行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方向，通过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一方面传统金融行业的效率明显

提升，服务范围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将衍生出新的金融服务业态，扩展金融服务内涵。具体做法包括：以监管科技和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为抓手，提升上海保险业国际竞争力；在保证客户隐私和监管安全的前提下加大数据开放，提升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核心竞争力。



2019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2019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复旦大学联合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开放数据，蔚然成林。“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由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出品，是国内第一个专门针对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专业指数，自 2017 年 5 月起首次在贵阳数博会发布以来，每年定期对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综合评价，精心测量各地“数木”们的树形、高度、粗细、材质与价值，以助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生态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邀请国内外学、政、产各界共七十多位专家共同参与，成立“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评估专家委员会，基于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借鉴国际数据开放评估报告指标体系的经验，立足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要求与实践现状，构建起一个系统、科学、可操作的评估指标体系，并根据该体系采集分析数据、制作指数报告、提出对策建议。

截至 2019 年 4 月，我国已有 82 个地方政府推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地方政府 13 个、副省级与地市级地方政府 69 个。《报告》从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

利用层四个一级维度及下属多级指标对这些地方政府的数据开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准备度是“底子”，是数据开放的基础；平台层是“面子”，是数据开放的载体；数据层是“里子”，是数据开放的核心；利用层是“果子”，是数据开放的成果。利用层是今年新增加的评价维度，旨在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后的社会化利用。

《报告》公布了 2019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报告》最后从加强政策供给、提供组织保障、营造有利生态、开放优质数据、优化平台运维、促进创新利用等方面对推进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2018 年 4 月，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被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采纳，作为其评估地区数据开放能力的依据。2018 年以来，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还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息化发展局监测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2019 年 5 月，《报告》被收录为复旦智库报告系列。成为复旦大学每年重点推出的 15-20 份有社会影响力的报告之一。

闭幕式大会圆桌总结 ■■■

如何重构东北亚格局？



自 2017 年朝鲜实现首次核试验以来，朝鲜半岛问题在过去两年中备受关注。朝鲜首次核试验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激烈反对，两国对立。2018 年局势略有缓和，两国元首进行了首次朝美会谈，半岛局势呈转好倾向。但是，今年举行的朝美第二轮首脑峰会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且朝鲜发射短程导弹，进一步激化两国矛盾，使得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构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和平成为众多学者的关切。

现阶段，中美之间大国博弈和美国对朝制裁都愈渐升

■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温，让本就扑朔迷离半岛无核化前景更为复杂。为改变目前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状况，必须要打开新思路、寻找新途径，促进半岛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发展。除朝美双边对话外，我们还可以重启六方会谈或四方会谈，在双边对话的基础上引入多边对话，促进国家间理解 and 交流。虽然朝鲜已宣布将把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而国际社会的极限施压和经济封锁，以及依然不明朗的半岛无核化前景，将导致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经济发展，以及东北亚经济一体化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 2049：应对经济实力上升过程中的挑战



2049 年目前来看还很遥远，但是谈论中国的“2049 年”有助于对长远问题的关注和把握，这其中就包括市场调控、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技术竞争、国际组织等话题。首先，就市场而言，鉴于相关证据表明中国的资本流动效率较低，相对 GDP 债务上升，中国需要依托更多的市场力量来进行资源分配，强调金融领域市场的主导作用。同时，在开放和投资方面，要注意调节市场的自由度和门槛，不能简

■ 承办单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单地放松管制；第二，环境问题。自从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出现了大幅上升。碳排放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市场调节，更需要政府灵活运用碳排放定价、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制、可再生资源开发等工具；第三，中国的人口变动情况以及老龄化人口的趋势。目前，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劳动力人口到达顶峰并开始下降。未来 20 年内，伴随着平均年龄的增加，55 岁到

65 岁区间的劳动力人口可能迅速增加，充分地利用和挖掘这个年龄区间的劳动力，不失为一种通过个体和国家的公共政策来共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种手段；第四，技术竞争。中国和美国已经是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但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存在一些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趋势，无疑会把自己困在弹丸之地，降低创新方面的效率；最后，中国参与了很多国际经济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是这些国际金融经济的机构也需要中美合作进行不断的调整、发展和改革以解决跨境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问题。其中，中国进一步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相关工作的进程非常缓慢，中国希望在这些机构当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是合理的。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富裕国家基本上拒绝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强他们的话语权。如果中美分别建立自己的国际基金组织并相互排斥，势必不利于世界经济效率的提升。为了设立一套国际机构或者国际组织，我们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欧洲、

日本以及像印度这样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参与到这个进程中。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 204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值得我们所有人拭目以待。



与 AI 共处——高明机器时代的人性



-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
- 合作方：
悉尼大学

现阶段的机器智能较早期的人工智能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具有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能力，但也具有不可靠性和特异性的缺陷。不可靠性体现在机器智能通过深度学习产生的结果难以预测，而特异性则是指目前的机器智能的功能主要局限于某一方面，难以满足通用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如何更好地开发、使用和监管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在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对人类大脑运作方式和道德伦理的参考。只有通过模拟真实大脑的工作机理，才能制造出真实的智能。而要构建人与机器之

间的友谊关系，则要考虑信任与背叛等人类感觉在其中的作用。在建构人工道德智能体的过程中，要积极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反思人工智能伦理的问题，如在人工智能中加入“道德模块”对其伦理进行评估。在设计人工智能时，可能发生个人诉求与团体诉求的冲突，如果过度关心个体诉求，则会降低智能机器的可信度。尽管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负面地评价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却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许多概念和问题，尚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错综复杂环境下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承办单位：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应对金融业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而“错综复杂的环境”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进行解读。第一个方面主要体现为经济失衡。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带来了世界经济高效率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开放带来的充分竞争也加剧了大国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在美国，大量机会和财富向拥有无形资产、高科技、金融业、电影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跨国企业和精英阶层倾斜；在中国，资源向全球化后的劳动和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创造财富的机会将对欧美市场过度依赖。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服务贸易上的巨大顺差和中国货物贸易的巨大顺差，给中美双方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乃至金融政策都带来了极其不稳定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把内部失衡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转为外部失衡问题调整，其凭借关税、知识产权、断供给，以减税的方式争取企业回归，倒逼贸易顺差国家大量开放市场，以缓解美国国内失衡的阶层固化和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就业问题，反而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更加严峻复杂。此外，世界各国都在面临扶持本国经济复苏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受阻的挑战，由此带来经济增长和货币信贷增长之间不匹配的问题浮上水面，将使全球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价格大幅波动，甚至某些国家和区域形成资产泡沫和债务扩大的风险。

第三个方面围绕着市场活力展开。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活力存在着一定的下行压力，稳就业防风险是国家提出的重要目标，而核心就是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抵押能力缺乏，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企业端和金融机构端的供给侧改革，化解缺乏核心竞争所导致的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背离的风险是当前中国经

济最大的挑战。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上升也带来了对高收益回报的内在需求，如何将国民储蓄转变为有效投资，从而尽快提升国民实际收入，已成为今天的中国市场活力复苏的关键所在。

在谈论机遇和努力目标之余，中国的发展也不乏亮点，并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和认可。首先，中国整合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不平衡，但其规模效应和活力必将配合完整的产业链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自贸区等多边合作的供应方式驱动中国市场提升，造福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第二，中国在金融科技等创新力量的先发优势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挖掘中国消费的长尾效应、提升企业的决策和政府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以及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的新模式；第三，中国亟需加快教育研究机制改革、实行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优化服务业和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营商环境。



工业再造



今天，世界经济为我们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数字行业的兴起对传统工业形成挑战。在过去，我们将资本投资或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但今天，中国处在全世界工业再造和数字转型和核心，中国企业需要用数字技术驱动产业升级和发展。

先例表明，传统企业在数字转型过程中，由于原有系统比较成熟，而且人员没有经过充分的数字化培训，转型的成功率极低。事实上，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工业转型和再造的核心是产品的再造。今天，传统的制造性企业面临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与其他企业相比的劣势，一是与上游零部件生产企业相比的需求劣势，二是来自下游的平台方相比的客户劣势。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传统企业应当更加

- **承办单位:**
埃森哲

重视软件和消费者。在产品再造的过程中，企业必须要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产品体验，用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

新的技术的确会有效地促进行业转型，但是与此相比，企业的行为逻辑更为重要。转型应当是目标和结果导向的，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和希望达成的结果，以此来确定具体采用的技术和方法。

在行业的转型中，我们需要关注新制造、新生态、新理念。新制造指企业的自我变革、生产创新；新生态指供应链的国际化 and 全球化，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新理念则是关注高等教育在产业再造中的作用，使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赋能产业发展。

流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流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治理中一个极为重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所有人都在讲经济与社会的今天，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鲜有讨论。众所周知，四大文明都起源于大河流域，人类更是离不开生态服务功能。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大河流域，包括长江、亚马逊河、尼罗河、湄公河等，基于政府的决策和管理的研究，分享如何管理流域系统的创新，以及治理的经验，这些工作不仅仅涉及到生物和人类学的关系，更关乎人类自身的命运。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尼罗河、湄公河、亚马逊、长江等区域都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所有这些发

- **承办单位:**
江西省流域生态演变与生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南昌大学）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 **合作方:**
南昌大学-WWF流域生态研究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会
阿拉善SEE华东项目中心

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建水坝、捕鱼、挖沙、环境污染的问题，它们的发展模式处于低级阶段，跟发达国家的流域是不一样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即同心协力为全球的治理做出贡献。回顾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化体系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我们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在把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团结吸收的基础上，向世界给出生态文明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嘉宾访谈

上海论坛 2019 期间，组委会邀请复旦大学知名教授以及学生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专访，听取他们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洞见，及对亚洲发展的思考

智者对话

我们希望有最好的世界

编辑：冯雨菡



■ Paulo Portas
葡萄牙前副总理



采访者：陈志敏
复旦大学副校长

陈志敏：Portas 先生，欢迎您参加上海论坛，也欢迎您来到复旦大学。您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内容极其深刻，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知道昨天您已经接受了多次采访，但我仍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您曾在葡萄牙政府供职多年，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评价正在进行的脱欧过程对欧盟的影响？您有何良策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脱欧过程的负面影响，并确保英国与欧盟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

Paulo Portas：陈教授，你好。首先，我要对上海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我常到中国，因为我想感受并了解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动态。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国际性论坛。关于你提出的脱欧问题，我必须承认，我不太支持就复杂问题进行全民公投这种做法。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英国脱欧问题的复杂性可以通过“支持”或“反对”得以解决。也许支持方和反对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个人倒是愿意投

票支持“留欧”，但我不是英国人。所以我尊重他们的投票。一旦举行全民公投，即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也代表了民意。议会是英国宪法制度的权力中心，议会否决全民公投是会影响脱欧进程的。在我看来，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在英国进行是让人感到奇怪的。英国人投票选举一个想要脱离欧盟的议会，原因是大多数英国人想要报复欧盟。所以，即使我反对，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无条件脱欧，因为这是民意。如果你对全民公投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大多数人想脱欧，所以政客们必须交出答案。英国和欧盟应该通过友好谈判处理脱欧问题，尽量减少损失，而对欧洲来说，英国脱欧是会造成一些损失的。对于葡萄牙这样的国家来说，它正失去英国这个欧盟大西洋一侧的伙伴。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大西洋集团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大西洋集团。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发展服务业经济的国家，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欧洲力量的 50%；英国拥

有欧洲 50% 的核军力。英国要是脱欧了，我们就只剩下法国（有此力量）了，所以现在的局势是有风险的，而且我打赌一定会达成协议。但在这份协议中，你得放弃一些东西，你得拿出一些东西，你还得接受一些东西。所以，英国不可能在不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履行协议。但不管怎样，就目前而言，英国还没有退出欧盟，但英国首相已经下台了。

陈志敏：是的，有很多受害者。

Paulo Portas：还有很多间接受害者。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没完没了的英国脱欧谈判中吸取一些教训。第一，永远不要思行不一。特雷莎·梅投票支持留欧，但她必须顺应投票结果完成脱欧。杰里米·科尔宾投票支持脱欧，但他却是亲欧政党的领导人，所以这完全是混乱的。第二，英国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国家，它不能冒着与地理问题有关的风险而单方面脱欧。对于英国来说，它不只有一个岛，它不能完全消除地域思想。例如，英格兰人坚持英国留欧，所以提出，如果英国脱欧，英格兰就要脱离英国。这样看来，英国脱欧事件结束的时候，英国可能会四分五裂。

陈志敏：所以，这就是英国在未来几个月要处理的问题。但是这几天，欧洲议会选举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知道英国的脱欧党会获胜。欧洲大陆成员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其政治格局中的位次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会保持不变呢？

Paulo Portas：首先，欧洲议会选举一般投票率较低。这也是体现欧盟性质的最为实际的例子。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国家集团。欧洲是一个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欧洲有很多国家。葡萄牙是欧洲古老稳定的边境民族国家之一，但欧洲有很多存在这样那样内部问题的复杂（民族）国家。所以，我倒是期待今天欧洲的两大家族能出现实质性的衰落，我指的是基督教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这种分崩离析的趋势（30 多年前，欧洲的所有议会都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党派）就是繁荣疲乏和忿恨全球化的征兆。这对葡萄牙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对于一个支持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我们对全球化没有忿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一样，也像东西方其他人一样，都曾是航海者，所以都是全球化支持者。同时，自由主义崛起，成为了一只新的中间派力量，更重要的是，极右翼、种族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也在兴起。往好的方面想，我认为党派的集中无法建立伙伴关系，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你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我认为他们会拥有超过 20% 的议员，而且他们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欧洲有四个大国，其中三个是英国（目前仍在欧盟）、法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第一大政党可能是民粹主义政党，如果不是，那也肯定是第二大政党。英国有脱欧党，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支持率与法国目前执政政党的支持率不相上下；意大利的第一和第二政党都是民粹主义政党，这表明欧洲的一些情况很棘手。如何与民粹主义者打交道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把他们带到政府，或者强迫他们面对现实，面对困难，在坏和不太坏之间做出选择，忘记乌托邦，这是一个选择。民粹主义者通常不能胜任政府工作，因为他们不喜欢处理现实问题。他们更喜欢在广场上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讲。或者你设法孤立他们，这是第二个选择。在我看来，如果你孤立他们，他们会打出受害者的牌。所以，我们不得不让他们承担一些责任。

陈志敏：您在昨天的演讲中表达了对欧洲在数字时代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的深切担忧。所以，欧洲国家会做些什么来迎头赶上呢？

Paulo Portas：我曾是葡萄牙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和古典保守派中右翼党派的领导人，我结束了长达 16 年的党派政治生涯，我还曾担任国防部长、副总理和其他职务，在卸任之后，我开始钻研并传授地缘经济学这个概念。地缘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创新的概念，因为通常人们打交道的是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是通过全球化和数字化通往新地缘政治学的途径。世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经济实现的。亚洲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都是通过经济和数字化实现的。这种变化改变了世界的平衡。现在，关税和贸易、移民、数据技术等问题已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棘手的政治问题。在我看来，欧洲应该对目前的局势感到非常担忧。因为，未来经济的 5.0、6.0 或 7.0 版大概就是数字经济时代了。欧洲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看一看前 10 大甚至是前 20 大技术公司，你会发现全是美国和中国公司，没有欧洲的公司。在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没有什么确定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会瞬间发生，但有两三个标准可以扭转这种形势。第一，欧洲必须在研发、创新（即私人部门）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欧洲早在两年前就被中国超越了，而且，如你所知，美国在研发领域有着非常强大的私人部门投资。第二，欧洲必须适应灵活性。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他的工作生涯中换了 11 次工作，但一个欧洲人只换了 4 次。所以，相比美国人，欧洲人不太容易换工作。第三，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财政差距，我认为

这一点是非常相关的。美国削减了 14 个百分点的公司税，所以我们就失去了 14 个点的竞争力。我最后再举个例子。陈教授，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新加坡、拉各斯或特古西加尔巴年轻人，你曾经成绩不错，你现在有想法，也有新技术，而且你想把这种新想法、新技术在业务中具体落实。那么是在欧洲更容易呢还是在美国更容易？答案是在美国更容易。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风险资本，更多的投资方，而且他们对银行的依赖更少。美国的金融业务都是在市场上进行，而欧洲的金融业务要通过银行。所以，如果银行情况糟糕，就不能很好地刺激经济。所以欧洲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地缘经济学非常有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如果 MBA 课程不教地缘政治学，那么未来的 CEO 们就会错过一些有关战略趋势和风险评估的东西，因为国际关系比以往更加经济化了。因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警告欧洲，我们的创新发展出现了问题。原则上，对移民持敌对态度也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陈志敏： 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投资服务审查机制，有人说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您怎么看这个审查机制？

Paulo Portas： 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我曾是葡萄牙政府中负责向中国投资开放经济的一员，且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谁是我们的盟友，那就是北约，我们也是美国的老朋友。但葡萄牙毕竟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所以我们喜欢广交朋友，建立多方依存关系，并在移交澳门后对中国采取负责任的政策。国际社会并未有太多成功的案例，但中葡却成功解决了澳门问题。因此，向中国开放我们的经济是透明的，无可指责的，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想说，布鲁塞尔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一方面，我有我自己的竞争政策，我不支持意识形态偏见，因为我认为它不符合经济理性。中国的投资者有时投资成功，有时投资失败。如果他们投资失败，他们就必须更好地了解欧洲的监管环境。另一方面，让我们回到数字上来。过去 20 年，中国在英国投资了 440 亿，在德国投了 240 亿，在意大利投了 150 亿，在法国投了 140 亿，在芬兰投了 90 亿，在希腊投了 70 亿，在葡萄牙投了 60 亿。所以，你认为法国政府能随便说出我不要中国的投资吗？我们要现实一点，我们欧洲人是自由贸易者，我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集团。我们喜欢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因为这两个市场为我们带来了最多的消费者和最多的收入。所以，让消费者自己决定，不要把意识形态壁垒放在中间。欧洲需要与美国好好地谈判，也需要与中国好好地谈判。我不相信推文，

我相信谈判，即使我承认发推文是一种谈判技巧，虽然这种方式很奇怪，但还是能起作用。我非常担心贸易战可能会升级，那样会失控的。

陈志敏：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贸易战的。过去葡萄牙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与中国和美国维持着平衡、牢固的关系。但问题是，如果特朗普政府强迫中国打这场贸易技术战，并向欧洲盟友施压，让其跟随美国的脚步，那么葡萄牙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您将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新形势呢？

Paulo Portas： 葡萄牙政府有一些有意思的措辞，我对此表示赞成。我们确切地知道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想脱离同盟，也不想打破友谊。葡萄牙始终对世界开放。即使我们只是一个拥有 1000 万人口的欧洲国家，在战胜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仍有大量债务，但我们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葡萄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国家，不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人民热情好客，而且在一些领域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缩小我们的世界视野呢？你的问题很有意思。以华盛顿为例，很多年来（三四年前），美国的机构确信俄罗斯是问题的所在。俄罗斯已不再是超级大国，即使它在核能领域实力强大。但俄罗斯不再是苏联，它也不再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蓝图。显然，正在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是中国。我觉得美国人前不久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奥巴马把言辞转向了太平洋，而特朗普每天围绕中国发推文。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但没有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此我有点不安。我相信，中美两国均有意愿达成妥协，因为两国都知道，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的升级、出招、还招、以牙还牙之后，情况会变得危险起来，因为这会影响信心，而一旦失去信心，就会发生全球性危机。全球性危机不利于特朗普或习近平继续连任。中美两国可以在艰难困境中生存下去，但全球性危机的风险会影响每一个人，那么到头来中美两国什么也赢不了。当你失去信心时，投资者会怎样考虑呢？我会推迟投资，或者取消投资。我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我认为欧洲应该改革，但也要支持 WTO。我们需要建立国际仲裁体系。我们需要建立贸易诉讼框架，控制事态升级。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无法进行更多的报复，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远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所以中国没有更多的美国商品可供报复。但我认为，谈判过程中有四到五个重要问题可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技术转让的问题，国家补贴的问题。中美两

国应该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去年1月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有意对某些框架进行改革。如果你想达成交易，你得相信交易是能够达成的，而且要准备好舍弃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G20大阪峰会上会再次会晤，我个人期望日本能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初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达成了贸易战休战协议，贸易战休战了六个月。但我不认为这种关于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认识只是美国共和党或特朗普政府的问题。想象一下如果民主党是执政党（这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调子大概会不一样，没有那么咄咄逼人罢了。我只是想知道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共和党人的问题吗，抑或是中美贸易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陈志敏：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根据所有的预测，不仅中国将会超过美国，而且印度也将在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

Paulo Portas：与中国相比，印度目前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较低。中国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如果亚洲出现问题，全球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全球45%的实际增长都是由PPP调节实现的，所以正常人都更希望亚洲大陆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陈志敏：我认为美国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分担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责任。因为美国始终认为自己是这个体系中的唯一领导者或霸权大国。我认为这种心态会在未来制造出更多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聊聊一个与上海有关的问题。最近上海发起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倡议，上海和三个邻省将要实行更紧密的次国家级一体化战略，即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基于您在葡萄牙和欧洲的管理经验，您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Paulo Portas：你知道，中国和欧洲的治理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大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就是欧洲一个大国的好几倍。几个月前，我在南京大学做了一次讲话，我问南京有多少人口，有人告诉我南京有1200万人口。这比葡萄牙的人口还多100万。但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合作方式。欧洲的许多单一民族国家联系非常紧密，你不必成为大国或中等国家，你可以是小国和外围国家，但仍然（与其他国家）联系密切。互联性是全球相关性的新中心。欧洲和中国的中央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之后，你可以去一些城镇、城市和省份。也就是说，我赞

成合理的一体化政策。当遇到一些文化差异时，你不应该消解文化特色，应该尊重他国的文化。每个人尊重全球的法律和各国的法律，为一体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遵守本国的宪法和法律。欧洲出现了一个问题。最近，一些欧洲人对移民有敌意。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欧洲的人口问题十分严峻。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将影响欧洲的未来。所以欧洲需要移民。零移民方案在现代世界中是不可行的，欧洲有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选择需要的移民，其二是让移民自己做出选择，或许你不需要的移民会选择你。欧洲人没有抹掉或消除所有差异，即经济上的差异，但欧洲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经验，即发展结构基金的共享经验，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希望上海与其他三省的一体化试点项目能够取得好的结果。我们必须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有很多困难，但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化世界。与你谈话很愉快。非常感谢。

陈志敏：是的，让我们期待更美好的未来吧。谢谢您，Portas先生。

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

高端访谈

编辑：梅雪纯



■ 金刻羽

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哈佛大学博士, 2014 年全球青年领袖

记者：您在去年提到，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学会用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与世界沟通，从经济角度解释清楚倡议的必要性，您认为中国在“说清楚”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素呢？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金刻羽：我认为中国首先要更强调“一带一路”的经济含义和经济利益，尤其是从共赢的角度，通过中国建立的平台让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入由基础设施建设构成的网络，就像科技一样。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因为有资源，有之前的经历和经验，所以可以帮助来建设这个网络。尤其是发达国家这一边，他们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中国作为这个网络的中心，可以更好地去参与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个就要强调它的经济含义和利益。具体来说，我自己的想法是，现在世界全都是一个网络，不管是科技、还是环保、学术等等，都是一个网络，那么基础设施跟电子网络、实体网络都是一个网络的概念。第二个是从政治角度，因为现在有方方面面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把这个网络建立得更好，使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个网络，就等于说我们都是一个深度顺行（deeply antegrade）的关系的话，能够更好地确保未来的和平与和谐（peace and harmony）等等，所以中国不是说要推哪个大国强国、或是争夺第一第二，而是一个网络概念：谁在网络的中心，谁帮助建立网络，谁来维护这个网络。这个我觉得是中国要强调的。

记者：面对跨国属性的国际难题，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一直积极促进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努力将自己塑造成全球网络的支持者和引领者，您认为中国成为现代互联

「全世界，不管是科技、环保、还是学术，都是一个网络。把这个网络建立得更好，使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个网络，能够更好地确保未来的和平与和谐。所以我们中国不是要推大国强国、或是争夺第一第二，而是一个网络概念：谁在网络的中心，谁帮助建立网络，谁来维护这个网络。」

世界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的资质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刻羽：现在需要一个大国来帮助建立这个网络，这是肯定的。小国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和协作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需要被考虑。现在美国从经济方面主要考虑自己内部政治、考虑为美国人民服务，尤其是在未来，很多的政策都是更偏向于国内的一些经济的情况，所以他肯定没有这样的资源和精力来去建立这种世界上新的网络。

那么当然，网络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我们在网络的中心，我们可以跟各个国家建立更多的连接，我们可以主导这个网络的发展，也可以在网络中间成为很大的受益者。除此以外，中国有资源，有资金，有协作的能力。与其他“一带一路”上国家的政治关系也是通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建立好的，包括跟前苏联的这些国家、跟现在的俄罗斯等等，在地缘关系方面已经做好了铺垫，才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协调者（coordinator）变成现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者（co-leader），那么“一带一路”也是它这方面的体现。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美国现在这种霸权主义已经慢慢凸显出一定的问题了，很多国家都出来反对。那么中国是否能够跟“一带一路”国家、跟俄罗斯建立另外一个相互关系（co-relation）来平衡美国跟西方，尤其是西欧的关系，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块，那么“一带一路”也是一个体现。

记者：经过多次谈判，中美贸易依旧僵持不下并纷纷采取措施，您认为这次双方加收关税的政策下，未来

中美进出口产品的经济形势会是怎样的？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

金刻羽：短期跟长期的效益可能不太一样。短期内，我觉得会是一种直接的经济影响，对双方都是不利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一些后果，对于美国来说，他的关税的增加实际上全都被美国的消费者承担的。特朗普觉得他们增加关税很多都是其他国家来承担的，实际上事实证明是美国的消费者在承担。然后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现在中美的经济关系是一种供应链的关系，中国在其中有很多出口、很多中间产品，那么这时候中间产品受到影响的话，美国的公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都是短期的一些经济效益带给美国的公司和消费者的影响。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经济，尤其是经济形势不稳定，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经济压力，这是在中国的一个更直接的效应。

那么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世界体系和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现在美国做的事是违反WTO的环境和法律体系，所以等于说美国在拆自己的台。那么把这个台拆了以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贸易关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美国一旦从这个基于规则的体系出去了，就很难能够想象世界经济会发生什么，这也许对

全世界经济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个是长期的问题。

那么再回到短期内，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一两年时间，因为在这个供应链下，如果美方再重新寻找其他的供应商，不是去找中国的，而去找其它国家的，可能成本会更高，对这些企业的压力也会更大，这些都会慢慢体现出来。同时最近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货膨胀，从中国进口物品的价格也已经开始上涨。

记者：您在年初提到，中国在贸易问题作出的让步是切合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的。从这次中国对美国的还击之举来看，中国对于自身贸易战略有什么改变吗？

金刻羽：肯定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过于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过于依赖进口美国的高科技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也许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年都可能愈加困难了，所以使得我们很多资源现在重新靠自己加大力度。一个是经济方面要靠自己，要拉动国内的经济，拉动消费者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出口。第二个就是要发展自己的科技。

创新环境下中国公共管理的作用与方向

高端访谈

编辑：王家欣、钟雨桐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

「无论技术怎么发展，人都是相关决策的主体制定者。所以需要让这些有关技术的决策保持在为人类造福的轨道上，而不是仅仅满足作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的好奇心。」

记者：薛教授您好，您刚刚在圆桌会议的发言主题是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适应性治理，同时我注意到您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是论述这个问题的，但您当时使用的是“监管”一词。您可否谈谈，这一个用词的术语改变意味着什么？

薛澜：传统意义上我们讲的政府职能包含了对市场的监管（Regulation），这个是政府保持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可以用于解决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自然垄断等。但最近一些年，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很多新的技术的出现也使得原来传统观念

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不得不发生变化。原来市场失灵的问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解决，政府在这其中并不一定一直起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使用“治理”一词的含义更加广泛。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某一领域涉及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问题时，政府的强力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操作方式和理念方面，政府都可以更加灵活创新。

记者：您曾经在2017年的一篇关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本土化的文章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即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您认为，中国在三者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薛澜：为了保证一个社会能够有序并且良好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得先保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是一个固定比例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历史文化、政治体制不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能在过去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其实就是比较好地把握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有有意识地宏观设计的功劳，也可能有部分无心插柳的尝试性举措的原因。对于中国的公共管理的学者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提炼出来，去把握背后深层次的一些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本土化的原因。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包括一些范式，都来自于西方，甚至很局限地发源于美国一个国家的发展经历。这一些理论用到某些欧洲国家可能还大体适用，但可能对于东亚的一些国家适用程度要低很多。

记者：今天您谈论到了很多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创新的问题。您之前也有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在引导技术创新的政策比较到位，效果明显，但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却缺少政策引导、支持。2018年末，我们看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典范”小黄车（ofo）就遇到了资金链断裂和用户大规模退款的窘境。您认为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咱们国家在商业模式创新配套政策方面的失灵？

薛澜：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了我们在面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时没有遵循适应性治理的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是一个反例了。可以说“ofo”“摩拜”等共享单车基本主要是从商业模式方面进行创新的，虽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技术创新的成分。

在我看来，政府在这其中发挥作用的时间太晚了。例如最早的时候，共享单车乱停车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这不仅

造成丢车率和车损率上升，也导致在很多地方大家直接采用极端举措禁止它们的出现。在这件事情上，恰恰不是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没有及时介入的问题。共享单车有非常正向的外部性：骑车节能减排，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等。如果政府更早地介入，和相关的利益方商量，将协商的工作做细，例如调研出最需要共享单车的社区所处位置，规划或者开辟附近适合停车的空地。那么另一边的共享单车公司也需要做出一定的技术或管理调整，例如根据停车规则，对用户进行信用和奖惩制度。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掌握起来并不难，实际上也很好操作，只不过政府和企业都没有较早地去积极沟通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您今天在圆桌论坛里几次提到的滴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

薛澜：是的。但是“滴滴”网约车的例子反映的东西恰好是相反的，它反映了政府过强的、缺少弹性的管制。例如，现在规定在北京如果要开网约车，必须要满足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北京户口，甚至包括具体车型等。其实这样对新兴产业的行业发展是不利的，和共享经济原本的理念也是相违背的。当然，这些政策力度可能也和“滴滴”出现的负面安全问题有关。

记者：今天在您的圆桌论坛发言里我还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表。这个图表很形象直观地展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杀死”的工作和可能催生的工作。如果那个图表呈现的结论和趋势是完全正确的话，我们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了。因为前者变化的比率是后者的两倍左右。首先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您在2017年的一个讲话里提到的希望做出的一个研究，去探究具体哪些工作可能会新产生，哪些工作会最先消失。一年半之后的今天，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和这个研究相关的新看法？

薛澜：我们一直想做这个方面的研究，但这个研究难度特别大，所以一些实证的研究还是没能得以开展。另外一点很具挑战的就是，技术的发展太快，应用也变化多端。所以坦率地讲，未来工作的性质本身就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讲未来哪些工作单纯地会替代某些工作，而是会出现全新产生、混合产生、自身演变的几种变化类型。所以在这种全动态化的演变中去做精确的预测是一件异常难的事情。

记者：就业问题和高校学生培养关系密切。您也是新任苏世民学院院长，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必然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您认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就业变革，高校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是否应相应的做出一些改变？

薛澜：首先我认为，不管技术怎么发展，我们高校都应该首先在价值观的塑造上把好关。因为无论技术怎么发展，人都是相关决策的主体制定者。所以需要让这些有关技术的决策保持在为人类造福的轨道上，而不是仅仅满足作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的好奇心。这种人文素养是我觉得最为核心的。

还有一点是培养学生的终生学习的能力。除此之外，还要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多元文化中的交流沟通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自我管理和及时反应的能力。所以我提出的适应性治理其实对个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记者：除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之外，我们看到失业与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您认为我们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如何改革以适应新出现的社会需求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薛澜：这的确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如何把握工作的替代节奏。有时候我们难以控制新技术出现的节奏，但如果我们能有一些机制让企业或相关机构承担工作替代中产生的一些责任，例如提供培训、协助转岗等，我们便能更加有序地而非波浪式地较缓慢地解决必然产生的失业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何从国家层面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但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简单，实操层面还是比较难。尤其是现在中国的职业型高中、高校发展欠佳，也加大了提供就业保障的难度。所以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加大在这一方面的调查研究。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了解到面临失业和转岗的很多不是二十岁、三十岁的年轻人，而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在认知能力、学习能力方面总体上肯定弱于年轻人。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投入针对他们的研究。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非常杰出的社会成就。很多也有志于进入公共领域的青年人可能和我一样，最开始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公共管理。回顾您本人的求学经历，您认为高校学生在接触公共管理的学习时，应该持有怎么样的态度，在大学期间可以做些什么来为日后自己真正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打好基础？

薛澜：从国内来看，公共部门最需要的人才还是那些具有全方位综合素质的管理人才。当然有一些特定的岗位需要有特定的技能或者理论基础。这些素质能力包括价值观、写作能力、沟通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和具体学习的专业关系不大，尤其是和本科专业的关联程度不大。所以对于想要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同学来说，不用太担心没有前期研究的问题。

但是在进入公共部门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自己先思考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未来的追求是否适合进入公

共部门。在中国，公共部门的确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在中国乃至很多其它国家，公众、社会对公共部门的价值的认识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远远不足。所以在个人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前，需要先做好可能被公众误解的心理准备。此外，现实一些的工资收入等方面，也许会不如进入到企业。这个心理准备也得做好。如果是能提前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中国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是如何运作的，也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进入公共管理部门。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公共管理领域非常突出的领军人物，您对于我国未来公共管理体系的现状与走向也有非常多的思考。值此上海论坛之际，您是否可以提一些针对上海未来的新兴产业发展的建议？

薛澜：首先呢，大家的印象中，上海的公共管理能力是很强的，理念也很先进的。上海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也有很雄厚的实力基础，无论是科技创新、资金还是人才方面。所以最基本的原创资源上海并不缺。但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一旦能力强，政府可能就会管得更多、更严。但对于新兴产业而言，在其发展初期，产业发展本身可能就会对原有的传统的一些产业产生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有效引导、助推 (nudge)，给予一定的信号，但不要一下把它管死，扼杀其发展潜力和空间。对于新兴产业，政府应该反应快，下手轻。这就是我的一点建议。

全程耦合视角下的流域生态保护

高端访谈

编辑：黄佳璇



■ 刘建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杰出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记者：您在近日的采访中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但仍有挑战需要应对”。您认为长三角未来生态保护方面的核心挑战在哪里，是沿江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污染治理？

刘建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生态环境的认识问题，即人们对环境生态问题方面的思想和态度。思想改变后，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以前大家觉得经济发展重要，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的重要性。但生态环境变差之后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害处，现在很多环境污染就造成癌症、肿瘤这些非常麻烦的疾病。我们强调人和生态系统的耦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怎么能够分开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

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企业结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很多企业结构不改革的话，对环境的污染是很严重的。首先就是第一产业——农业，农业需要生产粮食，但有许多人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是没有必要的，既造成经济损失，也造成环境污染。工业方面，许多工业耗电、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就必须要朝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向改革。第三产业也面临着改革。当然现有的污染问题也需要治理，这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应该同时进行，因为它们互相影响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也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没解决，另一个问题也可能无法解决。

记者：在2018年，您在杂志《Nature Sustainability》上发表文章强调相互关联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作为整体来解决。您可以介绍一下您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吗？

「有时候决策者比较短视……好多反馈需要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一般人看不到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搞科学的人能够认识这些问题，通过媒体使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另外，对于现实应用，特别是政府的政策制定上有哪些指导作用？

刘建国：各个部门，各个环境因素、生态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政府部门大部分都是各自为政。环保部门也是一样，管水方面的，管土壤污染的，管大气污染的，还有的负责生物多样性。但生物多样性也是靠水和土壤、大气条件的。所以就必须研究清楚其中的相互作用，有的可能是促进作用，水好了，土壤好了，植物生长也好。有的则是互相抑制。怎么让好的因素得到最大的利用，把害处降到最低，这就对政府部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个部门之间有分工，也应该合作，必须要找出互相关联的地方。

记者：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打造长三角生态环境共同体，建立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您认为这个共同体目前还存在怎样的短板？它的存在对于长三角流域生态保护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建国：一体化当然是件很好的事，能够提高效率、避免重复，也能够相互沟通提高环境保护方面的标准，这都是有好处的。但现在在理论上还缺乏比较明确的指导，大家的意向都是好的，都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达到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全程耦合 (metacoupling)，不仅仅是长三角一体化，跟长三角周围的地区，还有跟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的关系应该作为整体来认识。这样的理论能够指导政府进行长期有效的决策。

记者：在5月6日，IPBES发布了一份全球评估，讨论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成因，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您认为这份报告对全球性生态保护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它所提供的各项解决方案在中国应如何应用？

刘建国：先声明一下，我是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负责协调的主要作者(coordinating lead author)。主要探讨未来发展的途径。因为现在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强调这种系统观念，就是相互关联(nexus)，还有全程耦合。具体就是说要根据它的原因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针对这几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土地利用和水的利用方式。第二，环境污染问题。第三，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对森林的砍伐，这个直接对生物种群有影响。第四就是气候变化。中国现在对气候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很多方面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这对于上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影响到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问题。

记者：您在今天采访和昨天的报告中，都反复提到了全程耦合(metacoupling)这个概念。您认为对于这个概念的研究中，还有哪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刘建国：这个概念是我2017年提出的。全程耦合有好多成分在里面，有发送系统、接收系统、信息流、人流、物流等，是个很复杂的系统，怎么把它量化，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有内部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还有跟周边和遥远地区的耦合。比如大熊猫出租，这也会产生很多气候和环境方面的影响。这就需要研究有哪一些人在参与这份工作，还有反馈——出租以后获得的资金怎么花，花在野生大熊猫的保护上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我刚开始在做保护大熊猫的研究时，大熊猫的栖息地质量在不断下降，我们报道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这些事情。政府不相信，环境组织WWF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建立保护区后栖息地质量怎么会越来越差呢？所以我们结合社会经济问题，发现保护区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全国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好多，因为保护区内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还有家庭数量增加的速度更快了，这有很多原因，一个是离婚，一个是小孩长大后建立新家庭。人数不变，但家庭数量增加，这就造成人均消耗资源增加。比如一家五口使用一台冰箱，两个人也一样需要使用一台冰箱。离婚后，家庭数量加倍，父母一方去看小孩，这个过程需要消耗资源。

造成资源浪费。

记者：您一直提到这个概念还需要量化，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刘建国：这个方法有很多。关键就在于怎么观测数据，观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物质和人口的流动，还有信息流。信息流起什么作用？你得到一个信息之后，怎么利用这个信息？是弃之不理，还是马上把信息充分利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把信息利用后制定最佳的决策。

也可以建立模型。有时候你没有观测到相关现象，那怎么办呢？有的数据可能已经没法收集了。有的时候你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还没到未来，你怎么办？那就必须建立模型。

还有很多方法。比如采访，可以观测人们思想理念的变化。还可以参考一些重要的材料，通过遥感获得卫星数据等等手段。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很多。

记者：从您的专业领域出发，您可否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呢？

刘建国：上海一直处于经济文化领先地位，但上海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一个就是气候变化方面，这是尤其关系到上海未来的问题。还要从自然的角度来探讨，有些自然措施比工程措施更有效。比如说像自然生态系统，有好多植物能够净化空气、净化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把自然生态空间扩大一些，布局更合理一些。再一个是全程耦合，不只是考虑上海本身，还要考虑上海周围和离上海很远的地方(比如其他国家)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城市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全世界的努力。还有就是反馈作用。虽然你把你这个城市搞好了，但是别的地方不好的话，也影响你。因为现在很多城市的资源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来自农村，不只是周边的农村，可能来自非洲，或是来自南美。像家具，现在很多家具的木材就来自于拥有热带雨林的國家。就算这里的森林和生态系统保护好了，别的地方假如变差的话，对大气，对气候变化也很有害。全程耦合的重点之一就是反馈作用。反馈研究是很难的，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有反馈，而且有的时候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现在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有好多东西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且速度也越来越快，因为它反馈速度也快了。

记者: 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在国家间开展合作,共同综合解决环境问题呢?

刘建国: 首先大家要意识到这种相互作用,你的地方变好了,我的可能也会好。这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互利的关系,是互相反馈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个地方都实行可持续发展。我提出全程耦合理论框架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帮助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有些事情从长远来看才能看到反馈。有时候决策者比较短视,任期两年或四年,时间不够。好多反馈需要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一般人看不到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搞科学的人能够认识这些问题,通过媒体使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记者: 您对于2020年的上海和中国有着怎样的展望呢?可否用三个关键词,或者说形容词来描绘呢?您可否具体谈谈为什么选择这些关键词?

刘建国: 第一个是可持续性, sustainable。还有一个就是创新, innovative。还有就是全程耦合, metacoupling。

为什么选择这三个词? 可持续其实就是发展目标, 假如不可持续的话, 社会也没法长期地生存下去。这就是原因之一。要实现可持续性必须要有创新, 不能够采取老的一套, 低效的、浪费的, 资源效应低或者是污染严重的措施。要采取高效率、低消耗、高输出、高质量的措施。为什么选全程耦合, 第一, 全程耦合是每天每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对可持续性有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怎么调控全程耦合, 怎么使全程耦合更优化, 使内部耦合更优化, 还有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们有好多时候可能互相冲突, 系统内的耦合也可能和远程耦合有冲突的地方。那么怎么能够降低冲突, 提高和谐, 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整个全球能否达到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有好多公司都走向国外了。中国人口最多, 但中国人口毕竟只占世界的20%, 还有80%的市场在国外。所以远程耦合是很重要的。

记者: 您能简要谈谈这几天参与上海论坛的感受吗? 您对论坛未来的发展、在长三角流域生态保护中所起的作用有怎样的期待?

刘建国: 我觉得论坛挺好的, 有一些不同专业、不同地区的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但我觉得上海论坛和长

三角流域生态保护今后可以更多往交叉学科这方面进行发展, 有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科两个学科能够解决的, 需要好多交叉学科。像全程耦合就需要交叉学科, 比如工程、艺术,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与全球治理新秩序

高端访谈

编辑：徐雪



■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记者：金砖银行虽然早于亚投行成立，但亚投行的声势和进展速度都明显高于金砖银行，再者金砖银行是五国平分股权，决策机制等也相应受影响，目前外界对亚投行更加看好，您对金砖银行的未来怎么看？

张海冰：金砖银行和亚投行都是国际开发银行领域中的创新性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和亚投行都具有国际领先的治理和发展理念，它们都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面临巨大缺口的背景下成立的。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主要的倡议发起方和参与方，之所以要推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不是为了替代和挑战现有的体系，而是为了对现有的国际多边融资开发机构提供补充性的融资渠道，这是我们认识这两个新机构的一个前提。要发挥补充性的作用，那就是说原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存在一些缺陷，或者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要求，比如说基础设施融资缺口、绿色融资等，所以从这些角度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它们的重点放在绿色可持续基础设施融资上，能够对于现有的国际发展融资提供一个资金性的补充。

其次，无论是亚投行还是NDB，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应该以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其成效。亚投行所采取的是大股东模式，有些类似于西方传统开发银行比如世界银行，它关注的领域是绿色的能源和基础设施。NDB创新更独特一点，它采取的是金砖国家平权，而且后续加入的国家也不可能超越或是完全稀释金砖五国的主导地位。由此导致的一个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的话题：AIIB所投资的项目数量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迈入第二个十年，金砖国家及其合作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金砖国家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才能在持续深化拓展务实合作的过程中，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潮中闯出一番合作的新天地。」

好像比NDB多，而且引起的国际关注度更高，也更成功一些。客观来看，AIIB的成员多，100个成员数量是只有5个成员的NDB的20倍，影响力自然更多。而且AIIB有大量的发达国家的成员，很多项目都是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合作的，它项目的能见度非常高。而NDB第一批的项目就是在五个成员国家（不同地区）分别进行，它相对的项目能见度明显并没有亚投行这么多，所以大家就产生了一种质疑，或者说一种看法，就是NDB的运作模式并没有亚投行高效。诚然，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同，的确面临一个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相对而言AIIB是大股东说了算，效率更高，NDB则是五个国家要协商一致。

但是，我觉得应该以更长远的视角来看NDB，因为金砖这五个国家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面临着发展的问题，这个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它面临自身的发展转型，另一方面它面临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一个大转型，两个转型都是在同一个节点上发生。我说的转型，比如说中国从一个受援国向援助国，向更多承担责任、捐赠贡献的这样一个国家发展，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在调整，同时国际大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强势。巴西也面临类似的国内调整，俄罗斯、印度也是，每个国家国内的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又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影响。这些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是有影响的，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所以我们对于NDB的评价恐怕不能只用很短的这4年多的一个历史时段里的表现来评价，因为它仍然处于初创期里。

第三，我们对于AIIB和NDB这两个新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影响和合作未来，的确面临非常多的选择

或者不确定性。比如 NDB 的扩员进程？比如巴西放弃在 WTO 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恶化之后，对金砖国家的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一些不确切的因素都会影响到金砖的发展。但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把金砖合作和 NDB 适度分开。NDB 毕竟是一个国际组织，有办公地点、有行长、有组织结构。一定程度上它和金砖合作有关，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机构。所以在它未来的扩员、未来这些项目选择和内部治理方面，取决于原初的金砖五国合作的政治意愿，也取决于金砖银行自身的发展战略选择。

总之，我建议不要简单对比两个新开发银行，认为 AIIB 表现比 NDB 更好，因为它们虽然都是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它们创立的初衷类似，但它们的治理结构、所关注议题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我们对它们的考量和观察要放在不同的背景下来看。

记者：您有提及扩员也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自 2011 年南非加入金砖，舆论一直认为金砖需要继续扩容，每一次金砖会议，除了五国也会邀请其他新兴国家参加。您认为金砖扩容的可能性大吗？

张海冰：扩容，是金砖峰会扩容，还是 NDB 扩容，应该有所区分。金砖峰会的扩容可能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金砖现有的五个成员国在扩员的问题上面是不是有真正的共识，因为据我的了解有一部分的成员比如印度，对这种扩员有疑虑，当然也不代表印度的官方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有一些印度的学者，包括巴西的一部分学者，我们交谈的时候就提及，如果成员数目扩大的话可能会降低金砖的效率，所以说在扩员问题上面金砖能不能达成一个政治共识，这是首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加入金砖扩员的这个名单里面，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怎么样来体现这种代表性？还是需要去制定一个扩员的标准，否则的话这个扩员也很难有科学性，至少扩员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以及程序，这些规则都是需要先制定出来。总之，首先要达成政治共识，第二个要对达成扩员的规则和程序要明确，至少要有这两方面的准备吧。但目前来看这两方面的这个准备，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明晰。

记者：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曾提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必须制度化。当下，金砖国家合作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每一年的金砖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皆是在上一年的会议上定下，您认为这算不算已经形成制度化呢？

张海冰：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在 G20 期间，金砖领导

人还有个非正式的会晤，已经机制化了。

关键是这些对话，是不是能够促进金砖国家之间的互信，或者是能不能够使金砖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加强。再一个就是这些合作对话能不能有实质性的成果，以及成果是否能够实质性的获得落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总之，我的看法是第一，现在已经足够机制化了。第二，机制化到底解不解决问题才是关键，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增加政治互信，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实际的对话的成果而且成果的落实也是比较好的。

记者：特朗普在 3 月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见面时表示支持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甚至考虑让巴西加入北约，有分析师认为是为了降低巴西对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持。巴西是今年的金砖国家主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对今年的金砖合作有怎么样的预期？

张海冰：我觉得这是巴西作为一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无论是它加入发达国家集团 OECD，或者是它在和特朗普总统的宣言中宣布说放弃 WTO 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殊待遇等，都有其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会金砖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希望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就是说推动或迫使金砖国家需要在这个 WTO 改革的问题上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改革共识，这对于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就是，它会不会因为向 OECD 或者向美国靠拢而影响这个金砖的合作？我觉得也不要下这种判断，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外交都是多元化的、多层次的，也不见得就说我开展这方面的外交就会忽视那方面的外交，不要下这种定论、做这种结论。

记者：金砖合作已走过十年，那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您认为若想更切实地加强金砖经贸间的务实合作，应从哪几方面重点突破或推进？

张海冰：抱歉这个我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我觉得还是要依靠市场，而且还是要不断地提升各国国内的营商环境，可能这个才是根本。不能一味地依靠政府去推动，毕竟政府只能起引导性的作用，但是真正的决定力量是市场的力量。

区域协调机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作用

高端访谈

记者：徐文凯



■ 陈 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流域管理与发展研究室主任，十五年内三次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

「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离不开区域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只有理顺了中央和长三角、长三角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长三角一体化才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记者：对于即将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您最期待的是哪一点？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陈雯：区域协调机制。我们希望在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亮点。

记者：您在刚才的主旨演讲中提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或将落户在位于三省市交界处的青浦、嘉善、太仓、吴江等地。与前些年提出的“G60走廊”相比，“示范区”在合作的领域和层次上有哪些突破呢？

陈雯：这是此次《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目前还在修改之中，不久将公之于众。那么会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呢？简单来说，会涉及要素流动、土地规划和管理、公共服务（配置）、环境协同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具体情况还要等规划出来才会揭晓。

记者：上个月底，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相较于行政壁垒，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城市能否清醒地理解各自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定位。请问您如何看待三省一市在生态综合治理方面的现状和未来的定位？

陈雯：从各个城市自身分工来说，总体规划会有一个整体的定位导向，比如说什么地方适合开发、什么地方应该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但是，国家规划并不会涉及地方的具体产业方向。

而（长三角）中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式，和它自身的地

理条件、区位优势、人才、甚至是企业家的能力有很直接的关系，也与周边发展分工有较大关联，并由市场导向选择。一些地方政府希望中央政府在产业方向可以给他们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这是不现实的。任何地方的产业方向需要市场主体理性选择和地方政府智慧引导。

行政壁垒对要素流动的障碍影响方面比较突出。至于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制约。比方说生态环境比较敏感的区域，就要限制开发。第二，对一些沉淀资本巨大的项目，例如大型机场、大型港口、大型重化工业这类项目的建设，国家是需要对地方设置准入门槛的。至于其他领域，像是电子产业、生物技术等，则是市场根据禀赋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既有其必然性的规律所在，也有一些偶然性的机遇。

我们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一个告诫，或者说是期待，就是要尽量避免“简单模仿”。人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样是没有超额利润的。只有创新性地发展一些特色产业，一个地方才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收益和成果。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不是一个“政府规划”可以解决的。找准自身定位，就是需要转变思维，树立创新意识，找到最适宜的方向，进而有利于提升竞争能力。通过产业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带动人才、教育等资源的集聚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变局中捕捉到宝贵的发展机遇。

记者：您刚才提到，在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各个地方自身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每个地方而言，应当如何取得自身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平衡呢？

陈雯：这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企业需要做出理性选择。打个比方，一家企业需要避免同质化竞争或需要寻找配套企业，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产业链的最优配置。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门槛，推动各个地方的服务水平、营商环境要逐渐接轨，避免一些“政策高地或洼地”存在。这样一来，企业就会在更大区域范围进行理性、合理的布局。一句话，建设合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运作，是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做的。

记者：如您所说，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利益机制的调整、重构过程。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做出哪些努力？

陈雯：目前来说，中央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和管理机制。一些现有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妨碍了一体化进程。通过改革创新，只要打开一个小口，调整体制机制，就能激活要素流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搞清楚自身定位，然后在要在各个方面加强合作意识，资源、环境、产业、人才等等。面对问题，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协商解决，而不是回避问题、拒绝谈判与合作。另一方面，在协商合作过程中，不能以强欺弱、以大欺小。如果一方完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一些他方接受不了的条件，就会导致合作崩盘，这是没有意义的。

各个地方要在互信的基础上，畅通信息交流，开展平等对话。只有当信息畅通时，才有利于各方的策略调整，进而相互理解，最后达成协议。这一进程的法制化推进，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如美国有跨州协议，需要美国总统签署的，之后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用法律条框加以约束，这对协议的执行是很有帮助的，也很好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层级关系。

记者：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积极因素可以推动地方政府相应国家战略呢？

陈雯：对地方政府而言有三个积极因素：一是来自中央的政治推力。国家路线方针的贯彻、中央对地方的考核都是强大的推力。另外，中央还可以在更高的层面，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当然，中央着重提出原则性的指导和宏观的发展理念，具体事务的推进必须要靠地方政府。二是来自社会公众的诉求。交通、医疗、教育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强烈诉求，是推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一体化的重要考量因素。三是来自市场的诉求。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就会刺激地方政府的建设和改革。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生产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将推动整体营商环

境的优化，改变产业分布过于集中的局面。

基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地方政府能做的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破除壁垒、改善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流动的环境。第二，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动各地的积极性。第三，要保障生态环境，宜产也要宜居。这样一来，最终受益的将会是企业和老百姓。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合理布局，实现效益最大化。对老百姓来说，可以为他们创造便利的生活环境，发展空间更加广泛。

全球视野下的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高端访谈

记者：徐文凯



■ 顾朝林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兼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通过这次更高质量的一体化规划，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使长三角地区更加繁荣，最终发展为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全球经济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龙头地区、引领中国与全世界深度融合的关键地区，需要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和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和积极合作。高瞻远瞩，更要脚踏实地，长三角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记者：对于即将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您最期待的是哪一点？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顾朝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一区域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最期待的是，能通过这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和实施，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使长三角更加繁荣，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区”。

记者：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18》指出，以广州和深圳都市圈为主的珠三角连绵区，发展质量不如长三角，但在内部城市之间，联系度要优于长三角。您如何看待这一现结论？

顾朝林：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一个智库，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小城镇化的思路出发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份报告，单从结论来看，我不太认同。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的联系度，选取的指标很关键。综合各项指标来看，我认为长三角经济联系的紧密度优于珠三角。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在制造业为主体的阶段，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尤其是苏南和浙江杭嘉湖绍地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大家过去经常提“星期日工程师”，每个周末都有大量上海工程师去长三角其他地区的工厂里指导。以此为代表的技术、业务共享，体现了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地区是像长三角有这样经历的。到了最近，长三角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由制造业

转向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和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联系是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价值链一起发挥作用。有些联系表面上看不见，比如说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但实际上对经济联系度贡献更大。

其次，如何理解这种紧密的联系？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它是一个以装备制造为主体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要发展装备制造，首先要有原材料，这就涉及重化工、钢铁产业、塑料产业等与之关联的配套产业。

最后，从经济总量来看，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是三十万亿左右，珠三角加上香港和澳门也才十几万亿，长三角内部的发展水平和层次要高于珠三角。

当然，也不能说这个结论一定不准确。它可能是从其他角度，比如单纯从城镇分布和城镇化率的角度去考虑。这些指标是表象，深层次的技术、人才、资金等的流动是在区域经济联系度中是更重要的。

记者：有观点指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城市能否清醒地理解各自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定位。请问您如何看待三省一市在机制协调方面的现状和未来的定位？

顾朝林：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以后去珠三角，当地不少政府官员、学者和参与编制规划的人，都说这个规划也存在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它通过一套从上到下的完整规划，按城市的等级确定城市功能定位，例如全球城市，国际化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也就说在珠三角设置了“天花板”，其

它城市再发展也应该在这个“天花板”下“定位”。就像人一生下来，命运就确定好了，所以这些城市乃至为这些城市做研究的专家就不乐意了。《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还没有发布，我希望不要出现类似的问题。假如存在，我觉得规划编制者需要反思和规划编制理论与方法需要调整。

这主要在于：首先每个城市都有对现状的认识，也都有对未来的期待，不需要通过一个规划、一个政策或者通过一个文本来“框住”它的未来。我认为要减少行政干预手段，进一步“放权”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发展。很多时候，对城市的发展来说，会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景象。其次，在一个区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城市有不一样机遇和挑战，如何找到解决自身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对城市的发展才特别有效。最后，要把长三角一体化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中。要把重点放在如何使各个城市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内部竞争。为什么要提一体化？就是因为“抱团发展”具备共同向外争取的优势。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要通过做大蛋糕来分享更多成果，而不只是通过权力机制重新分蛋糕。

记者：有观点认为，上海现有的体制机制相对滞后，并不完全符合全球城市的要求。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上海未来要实现全球影响力城市，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群的龙头，还必须要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作为？

顾朝林：在这次上海论坛的报告中，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长三角建成全球最重要的“全球城市区”。“全球城市区”这个概念有四个内涵，首先就是要拥有一个发挥龙头作用的“全球城市”。上海制定了“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但这些年的动作还是不够大。比方说现在提的“五个中心”，它确实是全球城市需要具备的，但建成了“五个中心”也不一定就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概念是一座对全球经济起关键性作用的城市。比如建成了一个航运中心，它对地区经济可能起作用，但是对全球经济不一定有很大影响。航运业发展到“第四代港口”的阶段，船舶的制造标准、港口停泊条件、货物装卸的设备和方式等等，形成了一个整体。以鹿特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为例，它不仅仅是港口吞吐量大，就连“全球第四代港口”的造船吃水深度标准也按照它码头水深来制定的。

再如，“产业规模世界领先”和“引领全球产业标准”，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层次。比如说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现在不是经济最强的国家，但伦敦仍然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全世界日常70%的资本都是从伦敦流出的。那么，上海建设了一个金融中心，就是全球城市了吗？显然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努力，比如说金融人才。据说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教育的核心体系还是掌握在英语系国家手中，真正学通西方金融业的专家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成为“全球城市”不单单是经济总量大就可以。对上海来说，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步子迈得太小，时间久了是很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global city region（全球城市区）。长三角要成为“全球城市区”，只拥有上海一个全球城市是不够的。如果将上海定位成综合性全球城市，杭州定位成全球旅游目的地，苏州定位成面向新经济或者是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制造中心等等，当长三角有几个能够相互配合的全球城市，这一地区就会成为对世界经济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全球城市区”。

有人告诉我，中国现在有两条路对全球经济起关键作用。一条是北京海淀区的后厂村路，是全球半导体、信息技术研究基地，聚集了大量高科技开发企业。另一条是深圳到广州的沿海高速公路沿线地区，聚集了大量高新工业园区和半导体、信息产品制造企业。就是这两条路，每天交通拥堵的时间就能影响全球信息产品的定价。这就体现了全球影响力。但在长江三角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所以，我认为长三角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第三个方面，在于如何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件商品都不是一家工厂独立生产的。生产领域存在复杂的分工合作和利益分配，之后的流通、销售环节也是如此。未来的中国，要在全球起关键的作用，就必须控制部分产业或产品的全球产业链。简单来说，就是在相应行业中有更多的定价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由市场决定，由企业的充分竞争产生。而不是像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政策，那个叫做霸凌主义，是逆全球化的，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化、建成全球城市区，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长三角在参与国际化过程中，还要注意到资本、技术、全球价值链等方面引领作用的建设。

顾朝林：对。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就是“价值观”。比如说绿色发展，对资源、对环境，还有对劳动力的认识，过去我们不太重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正确的发展观念，对我们参与全球化很重要。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重视资源，重视环境。那么，您如何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城市群或者说一个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在长三角地区，又有那些具体表现呢？

顾朝林：一个地区的发展初期，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巨大，比如说地形、矿产、淡水资源、土地分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历史越久，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就越大。一个地区的人类活动会促成特定的文化孕育和发展。当文化在起关键作用的时候，其他因素就可以忽略了。比如说长三角，这个地方千百年来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区，就是它的文化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在区域发展早期的确起了关键作用，也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但是一旦这个地方的文化形成了，文化的作用就会慢慢变大。我们今天说起温州人，都会说他们的精神，比如说吃苦耐劳的精神、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的精神。实际上你看它的历史，温州这个地方，历史上水土自然环境并不好，唐宋时期才开始发展。宋朝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实用主义开始盛行，最终成为了温州地区独特的文化。也就是说，永嘉学派对温州台州地区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一个地方的文化土壤以及孕育出的人的精神，对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记者：刚才您从长三角参与国际化的问题出发，谈到了中国其他城市群和区域的发展状况。众所周知，当前中国提出了多个区域一体化战略、制定了众多城市群规划。您能否就不同区域间的统筹发展，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几点建议？

顾朝林：从中央政府这个层面来说，肯定是希望各个地区协同发展，那么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要重视公共品的配给。比方说，沿海发达地区超前发展，超前到什么程度？借贷、偿债的承受的能力如何？这些需要由中央政府调控。

那么地方政府，我认为主要任务是打造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平台，让企业、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把企业的发展，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有生长发育的过程，也有衰老死亡的过程。有的企业做得很大，但是做大以后一直依赖政府的“抢救”，这样的政企关系就不是良性的。应该遵循市场规律让一些企业“正常死亡”，否则它占了空间、占了资源，就是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新兴企业发展起来。

讲到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认识产业升级。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制定政策时，总想引进最新的产业，也就是我们说的“腾笼换鸟”。总是想把笼子都腾出来，把老的鸟赶走、去找新的鸟，其实过头了也存在问题。一个地方的产业是一个生态系统，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不实际的。我经常打一个比方，西游记里面四个主角，假如说都变成孙悟空的话，是没办法去西天的。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良性的经济社会系统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要维护好这个系统，让生态系统有安全保障，

使它有丰富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应当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记者：您在主旨演讲中提及“京津冀特大城市群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想请问在您这个课题中，哪一点对于长三角地区最有借鉴意义？

顾朝林：实际上这两个城市群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今天中国讨论区域一体化，要从更高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要关注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用京津冀，还是用长三角去跟全世界竞争？这是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京津冀、长三角这两个城市群，或者再加上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城市群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离开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影响中国在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

具体来看这三个地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公共政策是从北京制定出来，首都政治中心的功能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经济、金融又和政治功能相关联，所以北京也要发展金融业。京津冀地区是以政治功能作为主要驱动力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过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香港。香港的社会制度、城镇体系与西方联系很密切，实行资本主义的模式。中国也不可能全部按照这种模式发展。那么中国经济的核心在哪？当然是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的发展，完全靠政治力量，或者完全靠市场力量，都会存在问题。

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什么？就是说“存在是合理的”。我们社会经济的系统太庞大、太复杂了，不是哪一个学者或是政治家做一个设计、一个规划就了事了。毛主席很久以前就说过，是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一个英雄创造历史，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创造历史，这句话我是十分认同的。

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会慢慢演化，形成一些模式，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观察这种状态，观察它的演化趋势，研究发展过程中，什么因素在起主导作用。我们希望它向哪个方向发展？要给予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又需要提供哪些配套的公共品？如何通过公共品的配置来引导发展？在引导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空间的配置，二是土地资源的配置，还有一个是财政金融杠杆。

脑智融合及 AI 医疗的医学角度思考

高端访谈

记者：王江舟



■ Matthew Kiernan

悉尼大学中央临床学院医学教授
大脑和心智中心发现与转化部联合主任

「我在想，最终会不会发明出一台直接与大脑进行交互的计算机——一种真正的脑机接口。例如，假设你活到了 100 岁，在你将死之际，是否能够从你的生命中下载所有信息，将所有的人生经历储存在读出器（比如 U 盘）中。我想，一旦我们能够访问大脑，就能够更好地修复大脑。我们可以对异常路径重新编程。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科幻小说的桥段。但谁知道 AI 研究会带来什么。」

记者：首先提一个和圆桌会议有关的问题。会议主题为“脑智融合：人工智能超乎想象”，涉及神经科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AI）三大领域。那么，您如何理解神经科学、脑科学与 AI 的融合呢？

Matthew Kiernan：我认为，神经学始终是当代技术的代表。在 19 世纪 50 年代，技术仅限于尸检：取出大脑、切开并在显微镜下观察，找到疾病和死亡原因。近年来，在 20 世纪 90 年代脑科学的推动下，核磁共振扫描、人类基因组测序、大量临床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为患者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支持。问题依然存在——如何综合所有这些信息，在无需切开大脑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更好、更快、更准确的诊断。人工智能可能是推动我们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动力。大数据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此，我支持实施多学科策略，邀请基础科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师（他们都热爱数学）展开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原来，人体内的一切都受数学支配；每一个功能都能通过数学概率计算得出，我们可以写出一个通用的方程式：用来确定是否眨眼、是否举手、是否系蓝色领带，这些都能用数学来建模。而我们只需研究出算法。在今天的讲话中，陶大程首先展示了人工智能并不完美，他们可能会尝试研究人工智能以及如何让手臂、四肢和全身以确定的顺序一点点移动。我们看到，科技带来了更多复杂情况。这是把基础科学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好方法。

记者：那我们就称之为脑智融合吧，怎么样？
(Matthew: 完美) 脑智融合将促进 AI 和脑科学的共同发展。因此我想问，您认为目前脑智融合已经达到哪个阶段了？

Matthew Kiernan：我认为，目前 AI 的处理能力在 2-3% 左右。因此，我认为我们才刚刚起步，就像 15 世纪的船员试图弄清楚世界是圆是方一样。我们正处于 AI 技术的早期阶段。但在 20 年前，没有互联网和计算技术，AI 仍停留在科幻小说领域。而我们将见证这一领域的发展，这才刚刚开始。未来我们将看到其余的 90% 或更多潜力被释放出来！

记者：我看了您个人主页上的视频《铺平道路》。您提到“要实现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大量注资”。那么，您是否认为脑智融合是一个长期领域？这一领域确实需要资本，但不应被资本绑架？

Matthew Kiernan：同意。AI 的发展需要资本。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工业部门需要这些信息。他们不止想让 AI 用于临床神经学，而且想借此了解人们的决策方式，比如，当你走进一家超市时，你会买些什么作为今天的晚餐，你会选择哪些商品。神经学将支配着我们购买的商品、吃的东西和生活方式。因此，工业部门将越来越多地参与 AI。此外，在项目融资方面，工业部门的财力比高校或政府更为雄厚。因此，当人们熟悉和擅长使用技术时，工业部门会把他们带到工业类项目中去。这将成为我们最大的担忧：招聘竞争。但你知道，最初可能进展缓慢，但无论如何，都会有所进展。

记者：您的许多研究和项目都涉及神经。您在运动神经病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除了缺乏资金这一挑战外，您在实践中还遇到了哪些挑战？

Matthew Kiernan: 目前, 我们并没有治愈运动神经元病 (MND) 的方法。如果我对某个患者做出这种诊断, 我知道如果诊断无误, 那么这名患者即将死亡。一些患者的生命较短, 在确诊后几周内死亡, 一些则在几年后死亡, 还有一些特例, 比如斯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确诊后活了 70 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真正延缓疾病过程的新疗法。遗憾的是, 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这种疾病过程代表着什么或者这种疾病的诱因是什么。我在修习医学专业时, 了解到 MND 的病因是肌肉萎缩, 随后, 大家就开始研究脊髓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引发 MND。我们的研究表明, MND 是大脑引起的。我们当时说, 这是一种原发性脑神经退行性疾病。那时人们并不相信。即使是现在, 当我在会议上提出这种假设时, 一些听众就会站起来, 指出我的错误。所以争议还是很大。引发 MND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疾病是从大脑中的运动神经元开始, 扩散到整个神经系统。但我们尚未明确它在体内扩散的方式: 这种疾病是如何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 再到其他细胞的? 我们不知道。

记者: 您在今天的讲话中提到“复旦-悉尼伙伴关系”, 那么您对“复旦-悉尼伙伴关系”的未来合作有何期望?

Matthew Kiernan: 复旦在技术和机械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七台核磁共振扫描仪、经颅磁刺激等新技术, 但专家也许在经验和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因此无法充分利用新技术并产生最佳的结果。此外, 复旦还没有组织起研究者队列。我们可以帮助复旦组织, 对吧? 我们在悉尼已经拥有良好的患者队列, 因此我们可以帮助复旦规划和讨论相关研究。我的期望是也许从今天起, 复旦-悉尼协作伙伴关系各方可以派出两三名研究人员开始着手一项或两项研究。研究一旦开始, 我们会提供一些学术和财务方面的支持, 协助其开展规划工作,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还可以帮助组织和激励其他人, 包括工业部门和政府, 以取得更多支持。

记者: 那么您方团队在未来合作中将负责哪些工作?

Matthew Kiernan: 首先, 今天我和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和神经科专家进行了谈话, 他们都渴望双方会面。我们必须把患者队列集合起来。其次,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临床试验, 那么如果能在复旦用我们正在悉尼大学研究的试验药物进行试验, 那就太好了, 这将会是复旦-悉尼伙伴关系的一项重大成果。第三, 我们可以组织安排在复旦和悉尼大学进行相同的核磁共振扫描, 然后将队列组合起来。

记者: 您对脑智融合的未来发展是否有任何期望?

Matthew Kiernan: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预测未来不是一件易事。我在想, 最终会不会发明出一台直接与大脑进行交互的计算机——一种真正的脑机接口。例如, 假设你活到了 100 岁, 在你将死之际, 是否能够从你的生命中下载所有信息, 将所有的人生经历储存在读出器 (比如 U 盘) 中。我想, 一旦我们能够访问大脑, 就能够更好地修复大脑。我们可以对异常路径重新编程。这在今天看来, 似乎是科幻小说的桥段。但谁知道 AI 研究会带来什么。

记者: 让我们扩大视野, 从脑智融合转换到 AI+ 医疗健康。2018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了一份蓝皮书, 称“AI+ 医疗健康位列 AI+ 垂直应用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此外, 刚刚于本月闭幕的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推出了诸多 AI+ 医疗项目。那么在你们的实验室中, 有哪些使用 AI 技术的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相关项目?

Matthew Kiernan: 主要是成像项目。在悉尼大学, 我们把所有患者扫描数据都交由 Michael Barnett 教授和陶大程教授, 他们正在使用 AI 技术研究出更好的诊断算法。我们正处于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目前, 我们无法通过扫描对 MND 患者进行诊断。但或许我向 Michael 和陶大程提供 1000 份扫描, 他们就能开发出诊断疾病的算法。这将是一项伟大的进展。

记者: 下一问题与上一问题有关, 在你们的日常研究和临床治疗中, AI+ 医疗健康技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一比例是什么?

Matthew Kiernan: 未来, 我相信 AI 的作用比例将达到至少 50%。假设在 10 年的时间里, 我为患有某种疾病的患者进行了 10 次治疗。我应该首先为患者进行哪种治疗? 如果第一次治疗不起作用, 第二次治疗方法是什么? 而第 7 次到第 10 次又采取哪种治疗方法? 在第 7 次、第 8 次和第 9 次治疗中, 我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 AI 的作用, 你要做的就是提供该患者的所有详细信息, 比如, 57 岁、男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手臂无力, 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中, 让 AI 算法提出建议: 停止该治疗方案, 然后增加三种药物。

记者: 许多人提到了 AI + 医疗技术的优点, 但您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发现了任何缺点?

Matthew Kiernan: 首先, AI 也会犯错。在今天的讲话中, 我们看到, 有时候 AI 犯的错误比人类还多。另一方面, AI 是没有灵魂的东西。但什么是灵魂? 比如, 人类的存在总是难以预测。人类影响无处不在。

记者：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工业领域。有人说，AI+ 医疗健康就像一个难以实现的伟大梦想。就在 2018 年底，谷歌重组医疗部门，不得不削减对“耗资巨大、风险极高的突破性技术”的投资，而转向“盈利模式清晰、由政府或医疗机构买单、适用人群广泛的业务”。您如何看到技术公司从投资突破性技术到投资高利润业务的这种转变？

Matthew Kiernan：要想有所突破，你应该对人员进行适当培训或让他们接触这些突破。比如，1993 年，我经常用传真机发信息，但我的同事有电子邮箱，他说，我应该用电子邮件发信息。更好用。当时，我拒绝了，传真比较好用，因为我知道如何使用传真机，很简单。但后来有人向我展示电子邮件的工作方法，我学会后，当然，就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在网上发送信息。但如果没人教我，我就不会知道电子邮件的好处，也就会一直使用传真。因此，你需要让人们参与新的发现，参与突破。

记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您如何看待技术之外的那些外部原因？

Matthew Kiernan：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必须知道的事实是，商业公司的目的在于赚钱。一些公司有资金来处理环境等问题。但对大多数公司而言，真正的问题是盈利或亏损这条底线。如果盈利，人人得利；如果亏损，就会裁员。制药公司也是如此，当某种新的药物销量较好时，人人都很高兴。如果公司开始亏钱，员工就会被解雇。这纯粹是财务决策。

记者：我了解到自从您母亲患上运动神经元病后 30 年来，您一直在从事与治疗这种疾病有关的研究。我很钦佩您。我真的很想知道，在您的多年研究中，这种疾病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必须翻越的一座山，一个让你更强大的敌人，还是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力量？

Matthew Kiernan：前两种吧。其实，当今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导致我母亲死亡的这种疾病却让我选择进入神经学这一领域，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在那之前，我实际上从事整形外科工作。我喜欢研究骨骼。这是我想做的事。如果我选择从事骨科职业，我很可能会觉得无趣。所以我很高兴我选择了神经学，虽然我并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职业，因为我母亲死于神经退行性疾病。但我现在正在从事神经学工作，这份工作打开了一个有趣的世界，也是我今天来中国、来这儿的原因。我因此而获得了大量个人成长，享受了美好的时光并结识了一些朋友和出色的人才。但真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回想一下，我想说，

我们仍未找到治愈 MND 的方法。这才是真正遗憾的事情。因此，它是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你看过《徒手攀岩》这部电影吗？如果没有，我建议看一下。就像攀岩者一样，我想感受登顶的胜利。但这是一次致命攀岩。

记者：您是临床医生、教育家和科学家。您有许多不同的身份。那么您是如何看到您自己的呢？哪种身份更为贴切？

Matthew Kiernan：回顾过去，过去的全部，临床经验是让我感到最快乐的领域。你可以追求不同的领域，因为当你致力于某一领域，而进展并不顺利时，就可以离开这一领域，进入其他领域。我从大学辗转到医院，然后又回到大学。当医院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时，我可以回到学校。如果你只有一个专业领域，你可能会感到无聊和梦想破灭。因此，拥有多领域经验是有利的。我喜欢富于变化的生活。但如果回想一下，比如在上海的前两天，我参加座谈会，他们在谈论基础科学，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当有人和我谈论某名患者和病史时，我就可以综合这些信息。我喜欢这种感觉。然后谈论诊断是什么，怎么治疗，能让患者恢复健康吗？当患者回来，因被治愈而向你道谢时，你就会觉得很幸运——关怀另一个人真的是一种荣幸。这就是最棒的感觉，棒到有时让你想哭。

不断变化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挑战与机遇

高端访谈

记者：刘若一



■ David Dollar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为应对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全球经济大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实施更高的环保标准，对其海外开发融资项目进行更多的债务可持续性调查。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在短期解决，但脱钩对两国来说成本太高，且可能带来许多低效方面。」

记者：在反复承诺美中会谈已处于最后阶段之后，特朗普总统在5月5日用一系列威胁加征新关税的推文将谈判带入了质疑之中。接着，特朗普总统于5月10日对近三分之一的中国输美产品强征25%的关税。这些新关税对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

David Dollar：在上轮谈判之前，双方都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声明，预示他们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但是，我认为我们从最后一轮谈判中能得到的是，双方分歧严重。美国想让中国修正一系列的法律，而中国要美国撤消所有关税。从本质上来说，每一方都不同意另一方的要求，所以我们说他们分歧相当严重。特朗普总统通过将关税由10%增加到25%而升级关税大战。此外，美国的贸易代表还进一步列出了要被征税的中国产品的清单征求意见。因此，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并不明朗，但美国可能会一意孤行，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强征关税。所以情况现在看起来非常糟糕。而且，双方的争议现在已经十分公开化了，任何一方都很难放弃其立场。很可能习主席将会在大阪G20峰会上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同时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方案是两位总统好好谈一下，认定贸易冲突对任何一方的经济都没有好处，并告诉他们的谈判人员寻求折衷。但这肯定要花费数月的时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会达成一个协议。在那种情况下，本次贸易冲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

记者：在过去的几周中，双方都释放了一些信息说他们接近达成一个协议。但现在我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在谈判中，中国是否采取了一些错误的行动？

David Dollar：对于接近达成协议似乎是双方都做了一些误导性陈述。这些讨论都是私下进行的，所以很难确知。通常，每一方都很清楚它们所要的。所以，如果有人可以说我们有95%的可能达成协议，那通常意味着他们正准备满足另一方的要求。所以，回顾以往，在我看来双方的谈判人员只是彼此旧话重提。

记者：是你在2018年7月的评论中提到，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首先，中国经济大体上不太依赖出口。同时，恰恰相反，由于美元可能贬值，美国的保护性政策可能不会导致贸易平衡的改善。考虑到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变化，你仍持有相同的观点吗？

David Dollar：是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容易受损，将会迅速倒下。我不这样认为。首先，关税短期对两个经济体都无好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中国还有其他刺激经济的可选手段。从政治上来看，两位领导人都很难公开服软。所以，我并不认为让中国在其谈判立场上做出大的改变是件容易的事。

特朗普政府就会发现强征关税这一策略不会改善美国的贸易平衡。我们已经看到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这也是一国强行实施保护性政策时货币的正常反应。我们实际上看不到美国的贸易平衡有任何变化。在2018年的第四季度有点儿高，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有些低。但是，如果你看看过去六个月的情况，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很高的。没有证据表明其贸易赤字在降低。

记者：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坚持说关税对美国的经济有好处？更多的关税会增加通胀水平，也许他将其视为一种经济刺激手段？

David Dollar：当下美国并没有任何通胀问题，通胀水平很低。事实上，美联储有些令人失望，它没有让通胀更高一些。一些定价通过关税提升了，这实际上稍微给美联储解了围。所以我真的不认为这（通胀）是个大问题。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进口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含有多种产品，有一些制造产品如飞机，但也有大量的农产品和许多服务业产品。限制贸易对于美国的制造业有些许刺激效果，但对一些服务业和农业却产生了压制影响。特朗普总统似乎想要加强美国的制造业。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基本理由。

记者：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与新兴市场的关系。根据你对中国发展融资的研究，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大部分情况下遵守了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而不是附和国际标准。你曾指出，仅仅依赖接受国自己的法律法规可能会因这些国家自己的弱点而存在风险，而服从国际银行的标准则可能是既费时又代价高昂。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何种措施和改变可推荐给中国政府（即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公司采取的？

David Dollar：中国有着十分良好的境内项目环保法规，而且我认为这些法规的实施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了改进。在中国，环境的不同方面正在得到改善，许多城市正在减少污染，许多湖泊、河流都得到了清理。所以，我对中国的友好建议是在其他国家采取中国建筑公司在国内那样的做法，遵循中国标准和实践。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折衷办法，因为许多中国向其借款的国家的政策和制度都十分脆弱。如果不引入一些更高的标准，就很可能遇到实际的环保破坏。另一方面，我之前曾撰文，世界银行的标准很可能太高了，特别是在实施方面。世界银行很强调风险规避，所以，当其遇到任何需要权衡的情况时，它倾向于退出项目。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复杂的权衡问题。有时一个项目会有一些环保成本，但也会产生效益。政府不得不在决策之前掂量成本和收益。当前中国在估量境内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时做得相当好。因此，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的政策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记者：我相信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在努力实施这一策略时中国会遇到某种障碍。

David Dollar：问题是实施好的环保政策要付出代价。

做细致的环评费用很大。也许项目的一些方面会严重伤害环境，这时你就得变更项目，或者也许不得不花费更多以减轻环境影响。如果你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来掌管，它就会私下做出选择。从公司的观点来看，他们只是执行项目然后离开。所以公司要保持成本尽可能地低，而且它们不会真正地对环境担忧。总的来说这就是要进行良好的环境治理的整个基本理由。

记者：所以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监管其公司的海外实践。

David Dollar：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负外部性影响的例子。中国正在提供大量的融资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大部分情况下它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中国公司造成了大的环境灾难的案例，那会真的毁掉中国的声誉。所以，你所要做的不是通过中国的发展融资创造商誉，而是不要制造环境混乱而产生负商誉。政府对中国公司强制实施一些标准和法规符合中国的利益。

记者：谈到亚投行时，你提到了“如果亚投行的活动会给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施加一些压力来简化其程序，加速其基础设施项目，则这对全球体系会是一个积极的改变”。然而，亚投行的建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战略焦虑。那么，世界银行、亚投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之间互动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David Dollar：亚投行的发展已经在现有的发达国家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论。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它们选择了不加入亚投行，但它们是两大重要的经济体。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因为中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似乎是积极的，且世界需要更多的发展融资。我认为有某种与世界银行和其他银行的竞争是健康的。在当前的体系中，我们有不同的银行，但竞争不大，世界银行是全球开发贷款人。亚投行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它已经在给非洲和拉丁美洲贷款。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有亚投行、世界银行和其他全球开发银行的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竞争是健康的。我曾说过，我认为世界银行过分强调风险规避，也许亚投行更能承担风险。我也看到世界银行与亚投行之间有良好的合作，这是非常积极的。

记者：你认为亚投行的基本准则不同于其他开发银行吗？或者它们实质上是一样的？

David Dollar：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亚投行的章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世界银行的章程，但随着世界的变化有

一些积极的创新。但是我认为它大部分遵循了世界银行的做法。

记者：那么你如何预测亚投行的未来？显然亚投行不会只做一个地区性的开发银行，而是正在留下更多的全球足迹，且中国正在邀请其他发达经济体来加入其发展融资项目。这种合作模式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David Dollar：是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从二战中一跃而起，成为了世界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最大经济体。在设立世界银行时，它是拥有多数股权的股东，并总是由美国提名总裁人选。但它也给了其他国家很多权力。在某种开明的领导权中反映的是，你不得不吸引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国家来向这一机构投资。亚投行十分相似。中国并没有对决策的否决权，所以你先将中国的钱投入，然后邀请其他国家出资。这增加了钱款的金额，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补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开明的领导方式。

记者：亚投行很有希望会对世界做出此种积极贡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听到了西方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海外参与项目刺耳的批评，诸如债务可持续性、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等，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将中国的海外实践称为新殖民主义。关于中国政府和媒体如何回应这种批评你有什么建议？

David Dollar：我对中国的建议是：更多关注来自从中国借钱国家的批评，而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批评。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一些批评并无实据。但是在发展融资业务方面——为了让所做工作发挥作用，你需要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中国正在许多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融资项目。这些项目中有许多证明效果良好，但有一些不是这样。例如，在马来西亚，他们设计了一个2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太昂贵了，因为它不是那么大的经济体。实际上没有那种可持续性，且项目也未在那种（设计）水平进行下去。（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与中国进行了谈判，现在将项目的规模缩减了。中国愿意与马来西亚政府重新谈判这一事件是很积极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巴基斯坦。最初，巴基斯坦请求中国建设一些燃煤电厂。但是新一届政府上来后实际上想转向可再生能源，于是中国承包商就项目进行了重新谈判。在很多方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你得听听客户的想法，知道他们对项目的要求，而且常常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想要好的环境标准。如果你不得不重新安置人员，对他们应该公平对待、公平补偿。所以，如果中国能够考察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并做出调整以确保项目成功，情况就会是积极的。

再来谈谈债务可持续性。对此有些很好的研究，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工作。对于从中国借款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正在追求债务陷阱式外交确实不是一个公平的批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国家从中国的借款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太多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像老挝、柬埔寨、蒙古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所以总的来说有一些小国家借款太多了，包括从中国的借款，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实力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能只看是否有一个好项目，所以创造更多的实力才是好的。想想外国贷款问题吧。最终，这些贷款不得不用出口来偿还。所以，当你问到老挝可以借多少时，答案的部分取决于老挝可以出口多少。如果你借得太多，你无法通过出口来偿还，你就会发生债务危机。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一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些危机常常十分具有毁灭性。中国是在设法帮助一个国家，但是如果这种帮助以债务危机收场，那你就不是在帮助。另外，中国将会不得不通过免去这些贷款来结束这种帮助。因为当这些国家陷入真实债务（被称为不可持续债务）时，它们就不得不重新安排其债务偿还日期。中国最近已经不得不免除委内瑞拉的债务，并重新安排埃塞俄比亚的偿债日期。所以，对所有这些做出务实的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认为，在前不久结束的北京一带一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得到的教训。他强调了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显然，（中国的）领导层了解这一问题。习主席也谈到要提高基础设施项目质量，没有谈太多金额方面的保证。所以重点不在于项目的金额，而在于项目的质量。

记者：我同意你关于中国的领导层正在努力反思开发融资制度及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观点。我还有一点想问一下，我认为埃塞俄比亚案例是中国预测其会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实现更高经济增长的缘故，但也许对于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接受国来说，即使它们接受这些项目后像预期那样实现经济增长也不容易。

David Dollar：是的。这是真正重要的一点。我考察中国历史，还有越南历史的方法，是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许多经济改革，然后他们开始建设基础设施。正是经济改革与基础设施的结合才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基础设施为连通世界市场所必须，但政策改革甚至更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自由贸易的体制，连通市场就无关紧要。如果你不欢迎外资，就很难进入全球产业链。如果你不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情况就很危险。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从基础设施中得到了如此之好的回报，但危险是你只着重于这种回报而忘记了你需使基础设施变得有价值的政策。这是需要汲取的一个很好的教训。

记者：是的，我同意你关于基础设施不是发展的万能药的观点。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在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采访中所提到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在吸取经验、保持改进、更接近全球规范呢？或者是其完全专注于一种不同的模式？”考虑到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全球足迹，你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David Dollar：证据就是中国正在吸取经验教训并调整其做法。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项目的重新谈判就是保持灵活性的范例。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理解可持续性和做出变更的重要性。你已经看到了商务部对于项目的环保标准提出了至少是指示性的准则。我们已经谈到中国正在接近全球规范，我还想指出，全球规范本身也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中国也要参与形成全球规范。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记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圆桌讨论的主题是“中国 2049：应对崛起的全球经济大国面临的挑战”。中国会遇到哪些挑战？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David Dollar：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两个关键的挑战是：第一，中国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角色；第二，纯粹技术竞争问题，这多半也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正在为项目撰写的问题。中国已经从一个稳定的全球体系中受益，也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员中受益。但是，在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过程中，它需要在这些机构中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眼下，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就如何改革这些机构基本上意见不同。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有关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的不同方法，这只是一个例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要看到 WTO 进行改革以应对发生的全部新问题：服务贸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等。中国对于保持现状感到相当舒服，并反对进行那种深度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中国想扩大 IMF 的资源，得到我们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分摊额的更大份额。在数年之内，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所以它在 IMF 中有着非常深厚的利益。IMF 是贷款人试图防止金融危机或帮助国家管控金融危机的最后手段。然而，美国不想看到 IMF 扩容，不想看到中国占有更大的份额。所以，这些都是今后几十年中要解决的难题。中国有可能做出大的妥协，接受美国想在 WTO 中要做的一些事情，而美国会接受 IMF 扩容、中国应起更大作用的需要。三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通过努力达到目的。

另一个问题是每一方都有一个发展某些技术的民族主义欲望。有时人们用“支配地位”这个语言表达，但结果

很有可能不是美国或中国支配特别的技术，而更大的可能是每个国家的公司在某些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功。大量的证据显示，如果美中之间有更多的融合，总体来说就会有更多的创新，每个国家也会变得境况更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脱钩，代价会很高昂，每一方都会复制另一方正在做的，并且，创立将两方分离的标准会带来大量无效率的情况。倘若存在竞争关系，很可能有一些技术两方不想合作。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我们要建立一套使限制范围尽可能有限的体系，然后让两个经济体之间以及绝大多数技术之间存在许多合作和融合。

概括地说，是公司在竞争，而不是国家。在竞争的过程中，公司趋于与其他国家深度融合。大部分大型美国技术公司都想在中国开设研发实验室，因为那里有很多科学家和很大的市场来彻底验证技术。许多中国公司想兼并在美国的技术公司。所以，广义上来说，公司是自然吸引走向融合，但政府却有些精神紧张。当下，两国政府均反应过度。这是危险的时刻。所有这些问题都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且解决它们并非易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今后的 10 多年中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看到光明的未来。



嘉宾建言

上海论坛 2019 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部分代表于会后致信组委会，表达对论坛组织工作的感谢、对相关议题的延伸思考，及对论坛未来发展的期望。

Michael Spence

悉尼大学校长

祝贺 2019 年上海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多么有趣和刺激的一场盛宴！上海论坛为我们的地区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平台。我期待着 2020 年上海论坛的召开。

Paulo Portas

葡萄牙前副总理

祝贺各位出色举办 2019 年上海论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论坛，但我真的很兴奋。圆桌主题的建立层次、数量和种类都非常棒。

感谢复旦的朋友们。希望不久能见到你们。再次祝贺你们。

Susan Shirk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教授，21 世纪中国中心主席

我很高兴能在上海论坛上发表两次演讲。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很愉快，话题和参与者的质量也很好。复旦是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奠基者，我们应该尊重和借鉴。期待未来的上海论坛。

观点集萃

高端圆桌

脑智融合：人工智能超乎想象

Dacheng Tao

悉尼大学教授

AI 破晓：机遇与挑战

1. 在某些任务中，AI 现在可以与人类有相似表现，同时 AI 的结果返回速度要比人类快得多。然而在其他任务中，人脑处理能力与机器性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2. 深度学习正在改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们获得图灵奖的加冕就确证了这一点。深度学习算法对解决人体姿势或物体特征检测等问题带来长足进展。

3. 这是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但这次与前两次不同：我们有更强大的机器，我们有更大的数据库，我们有更多需求。

4. 我主要研究感知、学习、推理和行为表现，因为我相信这些领域之间存在联系，并且我们有很强的交叉学科背景。

5. 当训练和测试数据具有同一分布时，深度学习效果很好。但尽管我们已经开发了转化学习方法，但仍然不如人类推理那么好。

6. 传统学习理论侧重于考虑最坏情况方案，因此无法解释深度学习的泛化能力。然而，在诸如人脸识别等现实问题中，复杂性比最坏情况小得多（因为人脸具有许多共同结构）。我们的工作正式确定了这一概念，并证明深度学习有望在更深层次的网络中得到更好的推广。

7. 我们将进化计算引入到训练生成对抗网络（GAN）中，并且能够通过组合不同的损失函数来改善结果。

8. 人类可以从卡通画中学习：我的孩子用卡通图片学习动物，并且能够在动物园识别相同的动物，这对于机器智能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通过跨领域学习改善了相关结果。

9. 进展是一直涌现的：永远不要根据过去或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对其进行判断。

王守岩

复旦大学教授

深部脑刺激：智能调控人脑

1. 神经系统疾病很难治疗。在帕金森病的治疗中深部脑刺激（DBS）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并完全改变了这些患者的预后。然而，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深部脑刺激疗法在个体间还存在巨大差异。除了疗效以外，深部脑刺激的治疗成本非常高，这对中国等国家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开发低成本解决方案。

2. 深部脑刺激也为我们提供了获得长时程监测大脑功能的机会。目前，深部脑刺激疗法的挑战在于如何解码 DBS 信号中的复杂信息，这些信号与外部检测事件相关并且对外部刺激进行响应，但在时间尺度上（从毫秒到数月）是动态的。一般监测到的信噪比非常低，这使得观察到的数据很复杂（类似于“鸡尾酒会问题”）。我们将复杂的神经活动进行编码为复杂状态，并使这些编码与疼痛感知和疼痛调节进行相关性研究。我们确实发现了神经振荡与疼痛感知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其他疾病中是否存在类似的相关性（例如肌张力障碍和抽动秽语综合症等）。

3. 这个研究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希望研究出更智能和更动态的神经调制方法。我们正在开发用于不同疾病患者的交互式 DBS 方法的便携式测试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包括让患者在家接受测试，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测试，并且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

4. 在这个领域内还有不少附属课题，每个附属课题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彼此间还没有建立联系，并进行转化，有必要对不同的项目进行统筹和完善。因此，我们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多个机构进行合作，并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工业再造

Eric Schaeffer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
工业 X.0 业务产品制造事业部主管

产品再造，抓住增长新机遇

1. 数字化对于现有产业的变革影响巨大：消费者不再只对产品本身感兴趣，转而关注消费体验；产品的生产受到了价值链两端的挤压，组件、平台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因此，从传统产品到智能产品的转型成为必需。

2. 产品再造为行业转型的核心。产品硬件提供基本的功能，软件则成为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可以不断更新，根据用户需求、使用情形来进行调整。

3. 数字化使得更多的新技术被不断应用起来，成为工业 X.0 的源动力。人工智能作为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技术，能够将一个普通的产品变成一个智能的、富有体验感、能创造价值的未来的产品。

4. 未来的产品将结合智能度与体验度，将产品转变为服务或平台，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如此而来，企业便能够打开新的发展路径，在 5 个价值空间中发挥作用。

李杰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副董事长；
辛辛那提大学 NSF I/UCRC IMS 中心主任

工业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应用

1. 工业人工智能为一种系统工程，利用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对积累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对产品做出合理预测，并用数据驱动价值。

2. 工业与互联网结合造就了煎蛋模式，产品制造为蛋黄，顾客所需的服务则为蛋白。大数据分析对价值挖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工业人工智能的数据来源、质量与可用性、算法的选择、结果验证等都需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被重点考量。

4. 真正做好工业人工智能，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是第一步的。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最大化价值。

监管科技：共造金融业监管能力与企业活力良性生态

Meryem Duygun

国际金融与银行协会主席，教授

金融科技信贷市场：风险与监管合规

1. 目前金融科技信用领域的发展不是由银行主导的，而是由 P2P 主导。金融科技信用领域在很多经济体中发展较快，包括中国，美国，英国。金融科技信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程度和银行体系的竞争以及银行的监管严格程度有关。

2. 金融科技信贷有机遇也有挑战。其优点包括：金融普惠、金融体系多样化，为中小型企业 and 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融资渠道等。机遇同时伴随着风险。金融监管机构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如何让消费者有保障，如何稳定金融行业值得思考。

3. 监管机构不只是拥有数据，也应该最大化利用数据。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 (CCAF) 从学术界，行业的合作伙伴等有较为完整的数据采集。通过 CCAF 可以获得全球金融科技信贷的数据，对各国的借款目的、贷款人的身份有所了解，可以清晰了解全球的格局。

4.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会使稳定性恶化，监管者应该了解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性方面的影响。监管者应该支持金融科技方面的合理创新，同时制定能够追上金融科技发展的规则。



许闲

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监管科技：共造金融业监管能力与企业活力良性生态

1. 随着科技创新会出现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地带，监管滞后于科技发展，监管部门尚未注意到灰色地带，但企业在创新时也会有所顾虑，担心触碰合规界限。

2. 合规与监管科技的特性：数字化（不仅是抓取数据，在技术层面有更多要求）、敏捷性、实时性、集中化、适应性强。

3. 合规科技在金融行业的运用包括：报告自动化生成、交易监管智能化、风险管理高效化、身份识别模块化、合规管理简化。

4. 监管科技在金融行业的运用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监管、监管规则数字化、身份识别效率化、数字采集自动化、风险分析智能化和交易行为透明化。

5. 金融科技、保险科技的创新逻辑可以很好地在其他行业和领域推动，例如环境保护、医疗服务、食品卫生、公共事务等。

6. 政策红利一直在支撑合规和监管科技的发展。事实上，在创新的金融监管上国内环境还是比较宽松，例如 UBI 车险定价的数据国内企业普遍有运用，但国外驾驶人行为难以运用到定价中。大量的数据、优秀的互联网平台、普遍的互联网使用也为科技手段的运用提供了优秀土壤。资本也非常关注合规于监管科技发展。

7. 技术、业务、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有待培养，数据和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有待提升。

如何重构东北亚地缘政治？

宋日赫

朝鲜外务省和平与裁军研究所副所长

如何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危机

1. 朝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坚决反对外部干预，不容忍阻碍朝韩两国和平发展的尝试。

2. 南北合作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基础。朝韩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两国在相互尊重国家利益、明确彼此独立的基础上加强合作。

3. 朝鲜尝试与美国建立全新的双边关系与外交关系。美朝矛盾是历史性的，朝鲜承认美国当前解决问题的意图，有意愿积极推动无核化、减少核试验。

4. 解决半岛问题要强化朝美对话机制，推动新一轮对话，形成双边协议与共识。朝鲜不会向美国的单方面施压妥协，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在第三轮对话中各退一步。

5. 2018 年起，经济发展成为朝鲜各项工作的中心，朝鲜将优先发展经济、技术与人才，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打造半岛和平发展的环境。



郑继永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东北亚变局与应对策略

1. 东北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是半岛局势由单纯的“中俄朝—美日韩”二元对立转变为多元对立合作共存；二是军事安全主导的行为体同质化行为模式转变为附加了地缘经济等因素的复杂模式；三是由大国主导转变为各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四是出现了强人政治相互对立的情况，但这也成为了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形式。

2. 当前东北亚局势有几个特点：一是出现了多个解决朝核问题的机遇之窗，一方面朝鲜同意无核化并全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美国打开了首脑会谈的大门；二是由上而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遇到了困境；三是美国垄断性作用消退，朝韩作用上升；四是特朗普对半岛兴趣减弱，使半岛局势变得模糊。

3. 通过建构机制应对东北亚变局。一是重构合作机制，双边的巨大成果是建立在前期多边成果的基础上的，双边对话具有巨大推动力，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多边合作。可探索双边+小多边等创新机制，寻找新的突破口；二是应重塑半岛无核化的概念，明确无核化是合作的前提还是合作推进目标，阶段性去核能否被各方接受；三是要重塑半岛和平概念。



南海共同开发的创新思维与务实策略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中的动因和政策选择

1.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中的经济动因包括：对南海油气资源的需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南海沿岸国建立共同市场和经济一体化。

2.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中的战略动因包括：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和其他南海沿岸国发展友好关系，降低中美在南海竞争的紧张程度。

3.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问题上的政策倡议如下：一是促进南海地区良好意愿；二是寻求共识，划定南海共同开发海域；第三，限制在争议地区的单边行动；第四，在只有声索国的争议区开始共同开发；第五，讨论建立南沙资源管理机构的可能性。

裴氏秋贤

越南社会科学中国研究所副主任

从越南视角看南海共同开发

1. 南海共同开发背景：南海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石油运输的重要交通线，自然资源丰富。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与东盟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 南海共同开发意义：可以满足有关国家的实际需求；使得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互信；保持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开阔和平谈判空间、缓解冲突。

错综复杂环境下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盛松成

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司长、
现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美国加征关税难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态势

1. 我们应该动态、全面看待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实际上关税承受者并非都是单方面的，而且增加关税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2. 中国贸易结构多元化、服务贸易持续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都会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

3. 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看，美国加征关税难以改变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趋势，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将促进我国内需增长。

4. 我国应该保持定力，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Achim Wambach

德国欧洲经济研究院院长

全球经济的欧洲视角

1. 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对于德国、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都已调低，而对于中国的预期则持续调高。

2. 美国的保护主义加剧了对全球经贸争端的担忧。

3. 中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坚持倡导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中欧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4. 对于欧洲的担忧不断增长，英国脱欧为英国和欧洲经济带来挑战。2019年欧盟本身面临很大不确定性，首先欧盟机构面临新的选举，其次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仍然不定。





在全球转变时期提供公共产品： 来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观点

Carola Ramón-Berjano

阿根廷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对拉美的 潜在影响和主要挑战

1. 拉丁美洲应当保持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平衡，但不能迫于压力而制定政策和签署协议。
2. 在强调多边主义重要性和积极发展多边关系时，拉丁美洲在政策制定时也应当具有自主性，例如在接受外国投资时，应当切实考虑地区的需求和长期发展。
3.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方面能够给拉美提供经验，而帮助拉美能够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改善和提升，这是一个基于长远发展考虑的双赢局面。

Arlene B. Tickner

罗萨里奥大学政治科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主任

拉美和中国的南南合作

1.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一定程度上会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和推进造成损害。
2. 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需要拉美国家既能处理好国内政治危机，又能广泛吸取国外经验。
3. 重新审视全球治理，有以下三大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应当思考对彼此的认知是如何产生的，会对合作产生什么影响；二是避免区域一体化仅仅停留在区域治理而没有推进全球治理；三是讨论全球治理时应当考虑到更多可能的维度。

中国 2049：应对经济实力上升过程中的挑战

David Dollar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国际经济组织里的中国角色

1.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需要在全球机构改革与管理中扮演积极角色，中美合作是其中的关键。
2. 中国在金融和银行方面将有长足发展，在货币资金流方面，中国也逐渐成为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美国却希望通过反对 IMF 遏制中国发展。面对世贸组织的自由性、合法性下降等种种问题，中美双方需要做出可接受的妥协。
3. 中国需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一同改进 WTO 体系，促进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同时，需探索潜在可能，以促使中国接受 WTO 现代化，并促使美国接受更加强大的中国在 IMF 拥有更多话语权和更高配额

王 勋

北京大学教授

评论

1. 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2. 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在稳定币值等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对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性做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在推广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3. 研究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体系；在多边机构的框架下实现更多协调与合作。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与全球治理新秩序

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里约热内卢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和中巴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个“金色十年”：改革议程中的扩展与限制

1. 金砖国家的改革议程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经济金融治理，应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二是政治治理方面，应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同步。

2. 我们应该评估新成员国加入新开发银行（NDB）是否符合金砖国家一贯的合作准则，即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围绕改革议程的对话和参与。



沈逸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金砖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

1. 网络空间的新威胁存在于国家层面的网络武器竞争、网络空间升级影响国家政权的变更、跨国网络犯罪三个方面。

2. 应该确保金砖国家进行有效合作，实现国际化治理，使得金砖五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3. 从技术上来说，比起美国，金砖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并不占优势，但是可以从人口红利与网民人数上进行突破，推动未来网络秩序的新发展。

推进 WTO 改革：亚洲与欧洲的角色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欧经贸的现状，问题与 WTO 改革

1. 现状：中国和欧盟都是对方重要的经贸投资伙伴。近年来，双边经济贸易联系日益紧密，服务、投资等领域的交易规模稳步增长。

2. 问题：（1）中国对欧洲的不满表现在贸易摩擦、绿色贸易壁垒、市场经济地位、ABC 战略、投资限制等议题上；（2）欧洲对中国的不满体现在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低水平竞争环境、技术转让、投资监管问题上。

3. WTO 改革前景：随着世贸组织改革的推进，中欧经济关系将在新的全球环境中继续发展。尽管中欧在某些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沟通和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最佳方式。

Craig VanGrassste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

WTO 中的领导与决策

1. 不管规则上如何改革、规则化，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美国，也需要中国领导层的协作，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系统将会变得分崩离析。

2. 相对来讲，一小组的国家将会扮演整个系统当中更加领导性的作用，包括五个发达国家——英、美、法、德、日，三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以及中国。

3. 若要 WTO 有效地运作，就需要建立新的一组 G2，最早是美国—英国，之后是美国—欧洲，现在是美国—中国。

4. 如果我们不能就中美在世贸组织中的领导作用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协议，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世贸组织。



全球公共政策：全球化时代的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Sergio Suchodolski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开发银行行长

区域与地方开发银行的全球资源供给

1. 多边开发银行在提供全球和地方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开发银行经过 56 年多的发展，通过战略规划和预算支持，为米纳斯吉拉斯州主要经济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开发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第一，小微企业（面向小微企业的在线信贷）；第二，创新（为创新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融资，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建立伙伴关系）；第三，市政（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污水、固体废物信贷）；第四，可持续性（太阳能、生物燃料项目、公共照明、保护环境）；第五，农业企业（大中型企业、合作社、一体化、农业企业可持续经营）。

梁晓燕

世界银行资深教育专家

全球教育合作：中国经验的启发

1. 世界银行有三种方法来实现其目标：融资业务、知识和数据共享、宣传倡导。

2. 教育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工具，帮助人们更好地成长，帮助国家减少贫困。现在，教育被视为一种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世界银行希望所有国家加快对人的发展方面的投资，实现人们成长方面的平等，并愿意支持所有国家为我们的年轻人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学习、成长和成功做好准备。

3. 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合作，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范式需要转变：（1）推动新型伙伴关系由“南北合作”向“南南合作”转变；（2）认识到国家在教育规划和提供方面的作用；（3）诚实守信，实事求是；（4）提升政府的能力，不仅规定做什么，而且规定如何做；（5）平衡质量保证和制度支持；（6）以算术和读写能力为基础；（7）培育长期的全球伙伴关系。



金融科技与数字丝绸之路

Marius Jurgilas

立陶宛银行董事

数字丝绸之路 - 欧洲的观点

1. 金融科技可以带来更有竞争性和创新性的金融市场，但同时也可能出现垄断和过度发放贷款的问题。

2. 欧盟金融高科技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三个目标：创新，安全与充分利用机会。

3. 通过适当的方法可以优化金融服务，例如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来实现不同平台、货币和系统间的联通、加强金融体系间的兼容性以及提高抗波动性。

4. 站在欧洲的角度，数字丝绸之路想要取得成功，需要重点关注其能够给欧洲带来的互利机会、对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中国在金融领域合作、友善与包容的态度。

Sopnendu Mohanty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

金融科技合作与丝绸之路

1. 政策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帮助可以基于三方面：首先，通过政策提供更合规的金融服务；其次，创造途径使消费者能够接触到数字枢纽；最后，吸引人才投身于项目建设。

2. 新加坡的电子 ID 与数字经济在银行已经普遍使用，决策层与监管层在施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便利性和安全性的需要。

3. 纵向考虑，立法层可以采取从下到上的调整策略，关注私人企业的建议，从而促进创新；横向考虑，不同国家之间应该共同合作，遵守各自法律法规，确保网络安全。





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愿景、挑战、路径

阮青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一线参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感想

1. 推进一体化的目的，是希望长三角地区成为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带动中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地区间联手解决遇到的问题。
2. 推进一体化需要处理好龙头城市与协作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下一步规划纲要即将发布，其中基础设施相关的硬件项目与改革创新的软件项目并存。国家鼓励区域试点，而后复制推广。

陈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与区域合作

1. 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来源于合作红利，包括规模集聚、范围经济、低流动成本和低交易成本等；阻力主要来自结构性障碍与制度性障碍。
2.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是一体化合作达成的基础，统一市场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非常重要，需要通过谈判与沟通形成合作。
3.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在协调机制建立，重点解决定位与空间布局问题，力图将其打造成为贯彻发展理念的新标杆。
4. 长三角跨界地区存在空间、资源、公共服务等各类矛盾，其症结在于现有的多层级行政管理和治理体系。
5. 一体化应该是差异化、高效率、可持续、包容性的高质量一体化。

绿色金融发展与长三角一体化

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谈长三角一体化

1. 绿色金融一体化应注重生态保护问题。生态保护问题主要体现在规划上，要打破行政边界，推进落实一体化。
2. 绿色金融一体化治理应注重生态治理问题。比如太湖流域的一体化治理及跨地区的补偿机制，这些问题的改进需要地方协同发展。
3. 绿色金融一体化应注重生态价值实现的一体化。比如乡村的绿色农产品及休闲娱乐产品的增值等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撑和推动。

莫凌水

亚洲开发银行
绿色低碳发展顾问

亚洲开发银行的绿色投资

1. 绿色金融要实现环境上的“绿”和金融上的“利”。“绿”需要考虑如何制定标准使得成本收益统一到一个维度，“利”需要考虑如何将绿色成本效益货币化。
2. 基于“绿”和“利”，亚洲开发银行实行了两个项目——绿色金融的标尺确定及绿色成本效益的核算。
3. 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绿色金融投资基于战略上和项目上两方面的考虑。战略上考虑该项目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及亚投行自身的气候减排目标；项目本身考虑是否使用绿色技术、创新性融资工具及商业模式等。
4. 未来可尝试绿色成本收益的分享机制，解决绿色成本及绿色效益的内化问题，并且考虑如何将绿色效率的投资变现。



土地供应和都市增长 ——沪港及全球大城市经验探讨

陈诗一

复旦大学教授

《发现上海竞争力——长三角城市群外商资本报告 2008-2018》报告发布

1. 观察长三角城市群外商投资基本走势，可以发现最近十年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外商资本投资呈上升趋势；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增长主要的引擎；香港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三大行业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下降，高端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普遍上升；独资形式的外商资本占比增幅大。

2. 考察长三角不同城市群外商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上海的高端制造业溢出效应不突出，但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好。

3. 上海应利用现有基础，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要增加土地供应，充分信任市场调节资源的能力；应开发让多经济空间，吸引多元化经济投资，提高全球影响力。

蔡鸿达

香港大学兼职教授

香港城郊都市化的制度保障

1. 香港至少缺少 1200 公顷的土地供应，香港人居住环境昂贵且拥挤，获得公共住房需要长期排队。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农业、工业用地未得到充分开发。

2. 香港政府为解决用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政府开始新开发土地；九十年代以来，政府也在着手区域规划的工作。

3. 土地供应委员会提出建议，首先致力于开发受污染的工业用地，其次开发私人所有的农业用地。各方应合作把土地化零为整进行增值。

4. 新的规划是要求开发商把 50% 的土地交给政府管理，政府可以利用地契建设更多基础设施，通过土地共享提高城市周边土地开发的效果，满足社会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5. 土地共享概念也面临很多挑战，可能受到公众选择的阻碍，征税、补偿都会存在问题。



流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刘建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杰出教授 / 院士

全球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系統综合框架与对策

1. 长江流域是我国极其活跃的经济区，但人类活动却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2. 全程耦合框架有助于系统地了解、量化长江流域人类 - 自然复杂系统内部相互关系。

3. 流域管理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不同流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戎俊

南昌大学 / 江西省流域生态演变与生物多样性重点实验室教授 / 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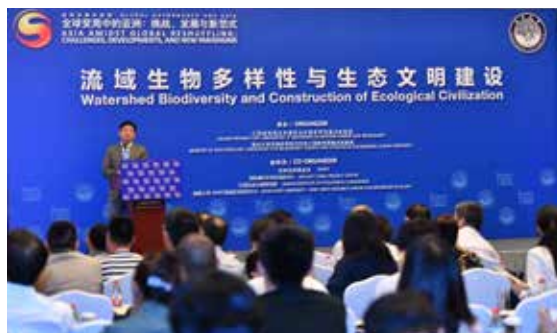
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与植物遗传资源

1. 植物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途径。

2.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是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内容。

3. 植物遗传资源的原位保护极其重要，但目前的保护效率很低，要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的平衡来实现保护。

4. 大河流域之间应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全球网络，分享自然恩赐，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谐与精彩

焦扬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开幕式演讲

1. 聚集全球女性健康发展，探索和谐与精彩。
2. 社会进步离不开女性，世界发展也为女性发展提供了舞台。女性不懈奋斗展现风采，而且身兼各种角色，用纯洁的爱奉献家庭。男性也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两性和谐使地球更加融洽。
3. 大学是女性工作的重要场合，复旦也十分重视女性的地位。复旦女性施展才智，挥洒汗水，巾帼不让须眉，为学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从事妇女工作自身的经验出发，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上海论坛为女性发展贡献智慧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为女性发展路途上的困难献技献策，真正研究出成果。
4. 中宏保险和复旦签订3年协议，共同为女性领域发展贡献力量。

张凯

中宏保险首席执行官

身心平衡，和谐精彩——女性健康与风险管理

1. 中宏保险和复旦发展研究院跨界合作，关注女性健康，帮助女性更多意识到自己的健康需求，正确评估自己的风险需求。
2. 中国健康医疗保障严重不足，中国的保险缺口逐渐扩大，医疗保障难以覆盖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3. 关注女性健康风险刻不容缓，女性保险理赔案件大多情况不乐观。
4. 女性风险管理态度积极、行动缺乏：女性预判风险，为家人保驾护航，但对自身的风险管理有待加强。
5. 关爱女性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女性焦虑难以说出口，而焦虑又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女性乃至社会发展。
6. 建议：女性应加大对自身健康的投入，关注压力管理，保持身心平衡。



企业社会价值的创造：创新、共享与可持续发展

Miguel Poires Maduro

欧洲经济联盟跨国治理学院主任

社会创新和影响力投资 从欧洲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

1. 社会创新和影响力投资描述了广泛的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市场或公共部门引入的社会挑战。
2. 福利面临的挑战：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不可持续的福利国家。
3. 欧洲和国际趋势突出了三个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和部门：社会创新，社会融资和影响力投资。
4. 在市场背景下，需要一系列旨在使市场回报与社会目标保持一致的激励措施。在公共部门的背景下，需要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方法。

Gavin Dixon

全球视野主任

全球 CSV 趋势及其对当今商业的影响

1. 从 CSR 转向 CSV，对公众、公司和社会都有益。
2. 企业有机会为其利益相关者、地区和全球社会受益扩大其全球经济，同时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确保企业的长期生存。
3. 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并获得长期生存能力的组织，在各个层面培养领导者是未来经济的关键。

与 AI 共处——高明机器时代的人性

Kai Riemer

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令人激动的前景与新问题

1. AI 的前景：扫描图像；面部识别；处理并分析数据。
2. AI 存在的新问题：未知数据导致的错误；机器所见不一定为实，可能分析错误。
3. 深度学习的本质是在确定的世界基础上进行没有被人类完全理解的模型的模拟。



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教授

深度学习对人类文明的长期发展造成潜在威胁

1. 深度学习的本质消灭了偶然性与个性，是趋于一致化。
2. 深度学习导致系统性思考能力下降，未来文明发展的可能性降低。
3. 深度学习只能应用有限领域，什么时候进行调用仍留有疑问。
4. 深度学习机制无法灵活地应对缺乏既有数据支持的新问题求解语境，因此，人类对于此类技术的过分依赖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应对新问题的应变能力不足。
5. 人工智能可能在挥霍人类文明现有的积累，因为利用人类智力的人工标注能力在下降。





上海论坛高端圆桌申办向全球开放

为进一步增强上海论坛的开放性，集聚不同领域、不同组织的广泛资源，并将上海论坛的平台分享给更多致力于推动亚洲发展的专家学者，论坛面向全球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企业等开放高端圆桌的承办申请。在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环境生态、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各个领域有较高影响力或在某一领域独具特色的国际知名机构，论坛将给予优先考虑。

欢迎有意向申请承办高端圆桌的各位通过邮件与我们联系。上海论坛期待与您合作！

联系电话：86-21-65642354、55664590

电子邮件：shanghaiforum@fudan.edu.cn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与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选编国内外定建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同时依托复旦海外访问学者科研优势，针对中国当前热点问题进行政策分析。

征稿要求

1. 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 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 200 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 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 3000 字左右，文末附 100 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投稿须知

1. 投稿信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 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 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康而力、辛艳艳

联系电话：021-65643764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智库楼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长期向海外学者开放申请，以加强学术研究及合作，促进中外学者交流沟通。

申请条件

- 1、该项目向以下人士开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正式职务的学者、资深专家或行业精英。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研究能力，年龄在 55 岁以下，非中国籍。
- 2、访问学者应从事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 3、从事政策导向研究的学者将优先考虑。
- 4、访问学者能够在 2020 年春季学期 (2020 年 2 月 16 日 -2020 年 6 月 27 日) 安排为期 30-90 天的访问时间。

申请材料

- 1、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附件下载链接)；
- 2、个人简历，包括教育与研究经历、已发表学术成果；
- 3、个人高清照片一张；
- 4、一份访问期间的研究计划 (英文，不少于 2 页)；
- 5、一封由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或所在研究机构负责人撰写的推荐信。

申请流程

申请截止日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
录取通知发放：2020 年 1 月上旬

工作条件

- 1、复旦发展研究院将为访问学者提供如下补贴：
 - * 机票：报销国际往返经济舱机票 (不超过两次转机)
 - * 酬金：1000 元人民币 / 天 (税前)
- 2、访问学者驻校期间，可使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和电子资源；
- 3、复旦发展研究院向访问学者提供研究室 (假期除外)；
- 4、访问学者在校期间可参加所有复旦大学的公开讲座、会议和论坛等活动；
- 5、复旦发展研究院为访问学者提供文章发表平台和机会，包括学术论文发表和媒体评论发表；
- 6、复旦发展研究院将为有意向的访问学者提供一次田野调查机会。

工作职责

- 1、访问学者应就以下方向进行选题，并在访问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 *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逻辑
 - * 科技变革的社会影响
 - * 技术驱动的产业变革
 - * 网络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 * 人类发展中的文化影响
- 2、访问学者应在访学结束时提供一篇论文作为访学期间研究成果；
- 3、访问学者每周至少两个工作日在研究室工作；
- 4、访问学者应积极参加复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研讨活动，并就其研究进行至少一次讲座；
- 5、访问学者应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出版物提供稿源，可以自己撰写，也可以进行推荐。
 - * 访问学者向复旦发展研究院提交的文章，将被甄选并推荐发表。访问学者须保证其所提交或推荐的文章不会引起任何版权纠纷。

联系方式

联系邮箱：fdifudan@fudan.edu.cn
联系电话：86-21-65642871
联系人：焦露曦 女士

复旦学者

复旦大学依托其深厚的人文、社会学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鼓励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交流和对话。为此，复旦大学设立“复旦学者”项目，邀请海外优秀学者来复旦校园从事文科、社科领域的科研。

申请条件

凡海外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副教授或教授均可申请。所有申请者都必须：

- 1、拥有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或课题；
- 2、使用汉语或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 3、拥有外国国籍且为外国机构全职工作。

已领取学校工薪的如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等、已成功申请科技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项目的外籍学者、或其他已获得学校工薪资助的短期来华专家，不得申请此项目。

项目要求

复旦学者来校时间为期 30 至 60 天，一般不超过 90 天。访问期间，每位复旦学者每个月至少做一场讲座，或主持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复旦大学鼓励复旦学者在项目结束后发表相关论文，并注明“Fudan Fellow”身份，于复旦大学留存一份论文。

资助标准

- 1、机票：报销国际往返经济舱机票（不超过两次转机）；
- 2、酬金：1000 元人民币 / 天 * 来访天数（税前）。

项目管理部门

本项目由外事处统筹设计并负责海外宣传，依托高等学术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发展研究院三个平台运作。高等学术研究院承接理、工、医领域学者，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承接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发展研究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承接人文、咨政领域学者。原则上由我校对口院系负责复旦学者的学术安排、基本接待和日常联络，上述三个平台负责提供学术服务、学者管理和可能需要的办公环境。

项目总结

请院系在访问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送以下内容至 fdias@fudan.edu.cn（理、工、医科）或 xi_lin1@126.com（社科）或 fdifudan@fudan.edu.cn（人文、咨政）：

- 1、访问学者本人高清肖像照。
- 2、其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照片（至少 2 张，像素不低于 500K）。
- 3、院系至少提供一篇文稿描述他来访期间的学术活动和来访成果（不少于 500 字）。
- 4、复旦学者在院系举办讲座，需提供电子版讲座海报，并在海报上落款“复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理工医科）或“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科）或“复旦发展研究院”（人文咨政）作为协办单位或支持单位。

报名方式

报名全年开放，预计总共邀请 70 名左右学者。

外籍申请人将 1) 附件报名表 2) 个人简历 3) 来华研究计划发给以下相关单位，由校内统筹评审，由相关单位通知录取并执行。

- | | | |
|-----------------------------|--------------------|--------------------------|
| 1、理、工、医科 | 2、社会科学 | 3、人文、咨政 |
| 联系人：彭老师，65648438 | 联系人：林老师，55665552 | 联系人：焦老师，65642871 |
| 邮箱：fudanfellow@fudan.edu.cn | 邮箱：xi_lin1@126.com | 邮箱：fdifudan@fudan.edu.cn |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不定期面向全国招收综合研究中国区域发展和国家整体建设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详细招募启事敬请关注官方网站（<http://fddi.fudan.edu.cn>）。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招收条件

1. 品学兼优，身体健康，无不良记录；
2. 具有(或即将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博士学位之一，获得博士学位3年以内、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从其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年龄35岁以下；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4. 具备全日制进站工作条件，原则上不招收在职研究人员；
5. 接受全日制坐班工作，并愿意承担研究院的研究任务。

相关福利待遇

1.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薪酬待遇参照国家和复旦大学的相关标准，并给予必要的科研活动启动经费，参与研究项目者按规定发放一定的劳务报酬；
2.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表现优异者有机会进入复旦发展研究院工作；
3. 全职博士后可租住学校博士后公寓；
4. 全职博士后子女为上海户籍的，按上海市幼儿园、中小学等入学规定办理；全职博士后子女为外地户籍的，入园入学政策与学校教职工同等待遇；

热忱欢迎海内外优秀博士到复旦发展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
邮 编：200433
联 系 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86-21-55664231
电子邮件：fddihr@fudan.edu.cn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为复旦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2014 年起, FJHSS 成为世界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 旗下的全英文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季刊, 由施普林格负责全球市场推广和订阅发行, 并通过其在线数据库向全球发行。《论丛》每期出版人文和社会科学各类专题、学术论文、书评等栏目。旨在为中外学术界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同时为推动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创双一流”的历史使命服务。

征稿要求

1. 学术创新, 言之有物的学术研究, 范围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前沿性、基础理论性各类学术文章, 尤其欢迎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历史、外交和国际关系、军事、环境、国家和地方发展政策和治理等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跨学科或专业性深度研究的英文文章。
2. 投稿必须是英文原创, 不接受从已发表的中文文章翻译而来的英文文章。
3. 投稿字数, 论文在 6000-10000 词左右, 书评在 2000-2500 词左右, 语言流畅, 符合英文行文规范。
4. 其他问题可参加本刊网站的投稿须知。

投稿须知

1. 网络投稿地址为斯普林格 EM 平台 <http://www.editorialmanager.com/fdhs/default.aspx>, 请按照网站要求注册用户名并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2. 请勿一稿多投。
3. 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 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柏栋

联系电话: 021-55665220, 13918554299

电子邮件: baili@fudan.edu.cn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65642354 55664590 传真：86-21-55664590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fudan.edu.cn